

第三章

聽，大媽說故事：
從離鄉到返鄉

義民人群一生歷經滇緬邊區戰亂流離之生活，這些離散故事不僅成了第一代長輩們的集體記憶，同時也間接傳承給下一代，並成為人群之認同意識。當我訪談第一代長輩時，驚覺對象幾乎全以女性為主。這並不是預先設定的，更無關女性主義，全因第一代男性與女性在年齡結構上的根本問題。

由於戰亂時期舉家遷離不易，家庭面臨誰走、誰留的難題時，大部分的漢人家庭皆由男人傳承家的命脈，而人們相信共產黨會清算男人，比較不會傷害老人與婦孺，另男人易於利用加入地方自衛隊、游擊部隊等管道脫逃，諸如此類的想法使得國民黨雲南人移民中男人數遠多於女性（Chang 1999: 38-41）。逃離家園後加入游擊部隊的男子，在撤往邊境進入少數民族村寨時，與村寨中年紀相差甚大的少女成婚，以致呈現當年英勇善戰的第一代男性長輩，如今面臨嚴重的凋零，目前聚落第一代人口中幾乎僅見女性的身影。

在閱讀有關清境義民人群之文獻時，發現無論是將領回憶錄或官方史料中，大多以男性為主要對象，少有對女性的描述。趙彥寧（2001b: 199-245）從其有關中國流亡、多重行動者與記憶的建構關係研究中，發現在言說與展演上都有相當的性別差異：男性的敘事通常為直

線型的，其時間性多與正統歷史吻合；女性敘事則散佈了斷裂、空缺、重複、噤聲、迴避與失憶。也就是說，相對於男性，女性敘事在正統歷史的參照地位不高，她們的言說展演往往藉由「病痛」與「生殖」的身體來轉喻。周思諾（2008）有關高雄海軍第一代眷村女性之生命經驗的研究則顯示，住在眷村的第一代女性，缺乏在地的工作機會，加上置身於國家控管的環境約束下，使其面臨著比她們的丈夫更為封閉的環境。我認為義民聚落第一代女性長輩們，如同周思諾所言的眷村第一代外省婦女，處於相似的性別弱勢，再加上「非漢」的身份，能得到發聲的機會更為減少。Paul Thompson（1978）強調可透過口述歷史讓性別弱勢發聲，以及打破歷史在紀錄過程中文字的霸權，使得這群原本被歷史忽略的群體，重新納入歷史範疇。換句話說，女性的經驗不僅僅只是性別研究中有關女性的生命經驗，同時也是族群、國家、戰爭、歷史等各種領域之研究需要理解的視野。而我也希望透過上述的概念，對清境義民人群的研究提供更多元的理解與想像。

聚落裡大媽們跟著丈夫逃難到臺灣時的經歷，由於相關的人事物早已所剩無幾，唯憑藉著大媽們的記憶、照片或來自家鄉的物件等，方能重新喚起這段過往的歷史。在訪談過程的

經驗中發現，預設「訪談題目」對大媽們是行不通的，因為她們有自己想講的話與想表達的事情，必須與她們培養了相當的情誼和默契後，才有辦法自然而然慢慢地讓她們講出自己的故事。這樣的經歷讓我反思，口述歷史不代表只有「訪談」，而是必須進入大媽的時空環境脈絡下，才能見到、嗅到、體會到，進而記錄下這些口述歷史的價值與意義。

說不完的逃難故事

阿妹阿！我告訴你們，我的逃難故事是三天三夜也講不完啊！

壽亭新村的雲南漢人金大媽，她的老家與大爹一樣都在雲南墨江。大媽做事一向謹慎，經過多日旁敲側擊並瞭解我上山的來意後，有一天，金大媽在壽亭新村廣場，遇見我與社區發展協會口述歷史小組成員林順麗，她一改過去小心翼翼的態度，用暖和的雙手握著我的手，熱情地邀我們到家裡聽她說故事。

然而，這故事怎麼講也講不完。

由於因時間關係，我們欲離開她家，前往博望新村參加社區火把節籌備會議時，她提議我們可以安排時間再去家裡一趟。她再三強調，從未告訴孩子們關於自己的故事，並殷切盼望我們的紀錄能讓後代孩子們知道。我們也在允諾她之後離開。大媽這句從內心所發出的深沉話語，牢牢在我的腦海中盤旋著。

記得那天傍晚，一進她家客廳，大媽即拿出和女兒回大陸老家的照片，我們邊看著照片，邊聽她說著逃難故事。

大媽生長在一個有七個兄弟姊妹的大家庭，她排行老三。由於前面已有兩個姐姐，她的奶奶希望母親下一胎可以生男的，於是將她的小名取作「轉生」。經歷過逃難的往事，過程她永遠記得：

那時候要不是民國四〇年（一九五一年）嘛！共產黨來了，家鄉的人都跑出來，共產黨很殘忍嘛！我們家裡大，游擊隊來家裡住過，共產黨來了，說我們是共犯，

所以爸爸就說一定要逃，全家一起逃，那時媽媽還是裹小腳呢！我一開始還不知道難過，還認為逃難像出門郊遊很好玩，一路還跟姐姐鬧著玩嘎。從家裡出來時有帶銅鍋，逃難的時候沒有菜嘛都是拿野菜吃，有時候跟人家買一點米，後來跟著游擊部隊後面走。

跟著游擊部隊後面走看似比較安全，但實際上仍充滿著不可知的危險。每天為了避開敵人除了要躲躲藏藏，也得放棄較好走的道路，改走山林小路。逃難過程最令人心驚膽顫的還不是走山林小路，而是大媽和她的媽媽、妹妹和姐姐被抓的經歷。在她的記憶中，姐姐還曾被吊起來打，幸好父親想盡辦法，他們才被釋放出來。大媽雖沒被抓過，但曾經發生一段這輩子都難以忘掉的驚魂記：

唉呀！最可憐就是被共匪追嘎！我們一會兒走山上的小路，一會兒走在樹林裡，天天都是不同的地方，換來換去的。有一次和姐姐走的快，我們在樹下休息、聊天

等爹他們時，沒想到共產黨的人突然迸出來，我們姊妹倆頭也不回就拼命的跑，姐姐被共產黨抓住，我跑到懸崖，手拉著有刺的籐往下跳，血一直流，又跑，後來跳到一個坑裡躲著，躺在那裡，跑不動了。不知道在坑裡待了多久，後來一個人在林子裡睡覺，很擔心有老虎，也到過一位山上百姓家裡。可憐嘎！那時候真的可憐嘎！

這一次所遭遇的災難，讓她一度以為再也見不到家人。她當時在林子裡找到水源時，向老天磕頭，祈求老天讓她能再與父母相見。大媽一臉不可思議地說：

上天憐憫我嘎！沒想到真的是靈驗嘎！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我躲在路邊的草叢中時，看見爹的頭，我爹跟一些人出來找我，我趕快跑出來叫他，哭呀！平常我爹是很嚴肅的，不抱小孩的，他看到我緊緊的抱住我，馬上叫人煮了一盆湯，當時餓過頭了，喝不下去，就這樣三天吃呀、喝呀，才慢慢好起來。你看我現在腳麻，裝人工關節，就是那時候受傷的嘎！

逃難的過程中，不僅有著上述的危險，也充滿不方便，大媽特別提到對女生女性生理期的不方便。她幽幽地說到，由於當時沒有便利的衛生棉，僅能將衣服撕下來，做成大媽口中簡易型的「騎馬布」充當著用，到了晚上去河邊洗淨、晾乾後再繼續使用。

種種經歷，有別於過往家中的富裕生活。從一開始的無知到漸漸體會辛苦、不方便與充滿危險，甚至讓她歷經與家人離散之生死關卡。其中更重要的是，「父親的擁抱」讓大媽有一種重新認識父親的感受，這份無法言喻的父愛，對她來說深具意義。在整個離散過程中，大媽透過身體實踐轉換成一生難以抹滅的意象，以致逃難的日子在大媽的記憶裡，深刻而鮮明。

「可憐」是聚落多數長輩們描述逃難生活時，最常使用的形容詞。住定遠的擺夷族玉雨大媽描述逃難時有一餐沒一餐、晚上睡覺就地取材、用芭蕉葉當棉被等，都是可憐的經驗。但女人在逃難途中，遇上臨盆，那更是一輩子最「可憐」的事。生小孩對女性而言是一輩子重大的事情之一，然而因戰爭所帶來的恐懼及逃難時的無奈，身心所受的苦一般外人相當難體會。她淚水盈盈紅著眼，若有所思看著遠方，慢慢地說起與妹妹離開家鄉，跟著軍隊逃難

的這段往事：

那個時候嘛！我背著孩子，我自己的妹妹大肚子，在逃難的半路生小孩。我們經過一個村子嘛！想進去村子生，但是村子的人不給進去，我們最後是在村子外的墳墓生的，那時候有人幫忙煮熱水，才休息兩天又繼續逃難囉！我妹妹還算好的，有休息兩天嘍。那時候有更慘的，現在住在桃園的有一對姊妹，當時生了馬上就走，完全不等人嘍，是在荒郊野外生嘍！怎麼說呢？那時候就是這樣子嘍！逃難嘛！等不得嘍！你說是不是可憐嘍！

說起生產的經驗，壽亭的伊芝大媽表示，她自己也在逃難途中生產，可以體會那種辛酸的過程。不過她強調，生下了小孩不能帶走，那才叫真的可憐：

我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就結婚了嘛，逃難的時候我已經懷孕了嘍！肚子很大

囉！到了邊界時，我們過湄公河還有聽到槍聲呢！可是沒辦法嘎！還是要跟著大家跑嘎！那時候已經痛了三天了，最後到了泰國邊境金三角時到醫院生下來，只吃了一顆蛋，算是幸運了嘎！生完三天就上飛機來臺灣了嘎！但是說真的，我們生了可以帶著走，是好的嘎！有一些人在逃難的半路走不動，把小孩丟下來的也是有嘎！不過也是有人撿嘎！你說可不可憐嘎？那才是真正可憐嘎！

逃難中生產或是帶著孩子，對大媽們而言，是一段大家共同的深刻記憶。昔日逃難的經驗，不是人人願意談的，也不是人人可以敞開心胸的，對某些人而言，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在訪談的過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藍賀大媽開朗暢談的情景。二〇一〇年夏天，我詢問藍賀大媽是否可談談她逃難的故事時，大媽大方允諾，並提議這故事要有情境，建議我們一起下廚做幾道菜，邊吃邊談才有意思。

這天我依約從埔里買了些菜後，一路開車直奔壽亭的藍賀大媽家，並與大媽做了包料魚、酥肉、臭菜南瓜尖野菜湯和春辣椒等豐富的菜色，另外準備了幾瓶大媽愛喝的海尼根。生來

有副好歌喉的她，在幾口啤酒下肚後，一時興起，不禁用起她的「老黑」¹家鄉話唱起當年從滇緬邊區到臺灣時的心情：

年輕時都在一起的家鄉朋友，

你們在那邊，我跟著漢人來臺灣，

我看得不得你們！

飛機飛到臺灣囉！我們見不著面了。

臺灣都是石頭地，樹都小小的，沒有我們家鄉的樹大。

阿姐、阿妹，臺灣和家鄉不一樣。

吃飯就像吃穀糠，喝水就像喝河水。

想到以前的老朋友，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著。

想你們啊！²

她除了為我解釋歌曲中的詞意外，並娓娓道來過去在家鄉的生活記憶：

我生下來三個月爸爸就死了，我有一個哥哥，是我伯父養大的。我們以前都是自己種自己吃，我們愛喝茶，我們把茶葉塞進去竹筒裡，等一段時間好了，就拿出來喝，香得不得了嘍。還有呀！我們穿全身黑色的衣服、我們女孩子的頭髮留到腰那麼長，我們去擺夷寨玩、學他們擺夷話、吃那個我們自己寨子沒有吃過的薩³，唉呀！我們那裡什麼人都有⁴，以前當小孩的時候，很好玩嘍！

年幼失怙，從小就由伯父養大的她，和其他小女孩一樣有個快樂的童年。從大媽開心的語調與笑容中，令人有一種時空倒流的感覺，彷彿這些往事似乎就發生在眼前，一點也不像離家已有五十年了。

大媽回憶初到臺灣時，由於陌生，看到這裡的景物都覺得跟家鄉不一樣，忍不住就想起家鄉的一切。生性開朗的大媽說，再如何想家鄉也沒有用，因為日子還是要繼續過下去，而

唱歌是讓心情變好的方法。藍賀大媽語帶驕傲的提起，自己是寨子出了名會唱歌的小孩，寨子裡的年輕人和年長者都唱不過她。她懷念以前在家鄉和別的寨子的男生對唱的經驗，因為這一唱，既使唱個三天三夜也不累。

（女）為麼什你來這裡？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

（男）我們聽說這裡有美女，來這裡看看風景。

（女）你看一看，我這麼醜，配不上你！

（男）你哪裡會醜？你很漂亮！

（女）河這麼大，水這麼大，你怎麼過來？

是走來、還是飄來？

（男）游泳過來的，不管怎樣就是要過來看看。

據藍賀大媽解釋，此歌謠為大媽家鄉男女初見面對唱之情歌。只是大媽居住的清境聚落

裡，沒有可以與她對唱的同族男性，她只好自己獨唱。從大媽的言談中可以感受到，大媽們原本有著屬於她們快樂的少女生活，然大時代的變動非她們能夠掌握的。

據多位第二代村人回憶，他們小時候常聽見聚落中大媽們，會在田裡邊工作邊唱歌，也會聚在一起做菜、喝酒時唱歌。但他們通常聽不懂大媽唱的歌詞是什麼意思。現實中，儘管沒有人可以跟藍賀大媽一起對唱家鄉的歌謠，她仍然藉由「獨唱」來表達對家鄉的懷念與想像。相同的，對其他大媽們而言，即使無人聽得懂她們唱的歌，還是要唱首家鄉山歌，因為這是治療思鄉的最佳良藥。

亂世情緣

據自己過去在清境義民聚落中的經驗，幾乎沒有聽聞過第一代女性主動提起自己的婚配關係。在協助社區發展協會進行社區的口述歷史紀錄時，林順麗主張長者們的婚配經驗應該被記錄下來，以致有機會把這一段有關大媽們的婚配故事給寫出來。



1

2

1 兩位大媽為我的到訪，做了一桌豐盛的擺夷菜。2 大媽堅持逃難的故事，需在做菜、吃菜、喝酒和唱歌的過程中談才有情境。

有關清境義民婚配故事，我們必須回到當時的歷史脈絡。二十世紀中葉前後亞洲動盪不安，從北方南下的中國陸軍第九三師部分部隊離開中國，至緬寮泰境尋求臨時駐地，大多軍隊在暫住少數民族之村落，從此，不少村中姑娘變成官兵妻眷，並面對不可知的嚴酷命運（謝世忠 2001; 2004[2003]p. 384）。

謝世忠（2001: 2）提到，當年轉戰於中緬泰邊界的國軍，當還以正規軍形式駐守車里宣慰司（現在的西雙版納）境內時，不少軍人即娶了當地擺夷或其他非漢族群女子為妻；而撤至緬北改組成游擊隊之後，曾有一陣子因隨時必須機動戰鬥或長途移防，所以禁止士兵結婚，爾後因將撤來臺灣，司令部才開放娶妻。據此他表示，一九六一年第二批撤來臺灣者為游擊隊系統，與一九五三年的成員類似，軍人大多為雲南籍，妻子則為非漢居多；然與前批不同的是，後批的家眷全來自緬甸北部各村落或部落。

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間，正值滯緬的「東南亞人民反共志願軍」準備從寮國往泰北清邁運往臺灣之際，一向禁止士兵娶妻成家的指揮階層適時開放戒令，許多游擊隊員在傳宗接代的觀念下，就在短短幾天四處尋覓新娘，進而形成一股「搶婚」潮，使得非漢族群體的女性

被強制與父母分離，從家鄉滇緬邊區輾轉來到陌生臺灣的過程中，義民妻眷每個人均有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同上引2001:22）。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自清末以來，雲南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就常於中國與緬泰邊境做生意，一般稱他們為「Hor」（段立生1986:62-65）。後來「Hor」被廣泛指稱雲南漢人，而非漢族妻眷在家鄉時，早已知道Hor的存在，且各非漢族群大都相當畏懼「Hor」，父母甚至會以「Hor maa」（漢人來了）的話來嚇哭鬧中的小孩；但因到了臺灣，非漢裔妻子避用Hor之稱呼，以減低自己由傳統習來之族群負面印象壓力，畢竟，他們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的父親（謝世忠2004[2003]a:403-404）。在了解上述背景歷史後，在往後的訪談中，我似乎慢慢地可以理解聚落裡的大媽們，為何以「阿兵哥」、「軍人」，來稱呼自己的先生所屬的身分了。

年過七十的藍賀大媽，她的先生是一位村人口中的回教徒，據她的女兒敘述，父親在當時的部隊中是擔任照料馬匹的工作，十分懂得藥材和一些醫理。雖然，藍賀大媽是位難得開朗的長輩，但在一次共食期間聽她唱歌之餘，無意間問起為何會嫁給大爹時，大媽睜大眼睛

看著我們好些時候，接著她深深吸了一口煙，頓時紅了眼眶激動的說：

怎能不嫁呢？人家拿著刀抵著脖子，我說阿妹啊！不嫁的話頭就掉到地上了嘎，那時候河啊！都是紅紅的，整個湄公河啊！都是紅色的嘎！怎麼辦呢？我們都怕漢人，怕死囉！怎麼可能嫁給漢人呢？我們這種人都一樣啦！都是怕漢人，不敢嫁給漢人的嘎！我們年紀差那麼多，怎麼說呢！我們寨子很多女的都嫁給他們阿兵哥嘛！來臺灣總比死好，不來也不可以，那就跟漢人來了嘛！

這是多年認識藍賀大媽以來，第一次聽她談起有關自己的婚姻，也是第一次看見個性樂觀的她，表露出沉重與激動的情緒。原來大媽十七八歲時，大爹的部隊來寨子，當時大爹已經四十歲，尚未結過婚，寨子裡有不少人嫁給像大爹他們這樣的人，嫁了之後就跟著部隊走，跟著逃難，也就這樣來了臺灣。或許因為苦難的人生歷練，讓大媽學會豁達，講完這些沈重的話題，沈默片刻後，她又恢復樂觀的心情，並對她的生命經驗下了註解：

四十八年（一九五九）時，嫁給大爹，四十九年（一九六〇）生老大，五十年（一九六一）來到臺灣。五十歲時小孩也都大了，生活壓力也小了，有空時就常會跟朋友煮個菜、喝個酒、唱個歌，開心一下，有時也會去春陽原住民部落玩，像我們現在這樣，做菜、唱歌，開開心心的不是很好嗎！

與藍賀同鄉的伊芝大媽，平日在女兒的民宿幫忙，本身注重保養又愛打扮的她，讓人看不出她年近六十五歲的年齡，村人總喜歡稱她「辣媽」。她笑著說起，以前家人都是放一把火，將地裡燒過後種穀子的，小孩子總是在要採收時，穿梭在地裡，或是拿著綁上東西的竹竿，站在高高的地方趕麻雀，她表示那時生活簡單、快樂、無憂無慮，但一切單純的生活都因軍隊來了而起了變化：

軍隊來了，那時我還小不懂事，一樣天天到外面玩耍。有一天，哥哥要我嫁給當時是軍人的大爹，大爹大我有二十八歲，結婚那天他帶著棉被和金子來家裡，不

結不行嘍！但是我不知道結婚是做什麼嘍！結婚後，我一樣住在家裡，我還是跟小朋友玩泥巴、去河邊玩水，玩扮家家酒。大爹人很好，很擔心我會掉到水裡，一直要我小心，他很照顧我，所以說我很甘心照顧他三十年嘍！

到了臺灣，因大爹年紀大做不了幾年的農事，田裡的工作，如揀菜、打藥等總是她一肩挑起。白天忙碌的工作讓她無暇想家，但到了晚上夜深人靜時，常常因想念家人而躲在棉被裡哭。她表示幸好大爹溫柔體貼，使她寬慰不少。而她也強調「心裡面要打開，要快樂，不然不行嘍！」勉勵自己以開朗的心，來面對過往的記憶。然而，面對苦難的過往，不是每個人都像藍賀和伊芝大媽有開闊的胸襟。一輩子到老仍充滿遺憾的，比比皆是。

由於聚落裡的第一代大爹多已凋零，林順麗於規劃口述歷史訪談對象時，便積極的安排訪談一位於博望新村的蒲大爹。有一天，我們迎著晨曦，出現在松崗大街上的蒲大爹家。那日，一道溫暖且明亮的陽光灑落在大爹家的客廳，我們在如此恬靜優美的氣氛中展開訪談。

林順麗是博望新村的第二代，與蒲家熟識，所以當我們一進蒲家客廳，在簡單說明來意

且架設好錄影機後，個性率直的她，一開口便起問大爹如何認識大媽，又問他們是如何結婚的？然而，抽著煙的大爹，並沒有直接回答，僅是繼續大口抽著他的煙。在一陣沈默之後，大爹並沒有多說什麼，僅淡淡地表示以前常有人來訪問他。這時大媽從廚房出來，正要去菜園澆水。林順麗見狀，便問起大媽同樣的話，她欲言又止的用手揮著說「不談了，不談了，都過去了，談那個做什麼！」後來我發現，若蒲大爹同時在現場時，大媽顯得不願意談。不知有意或無意，這時大爹起身離開屋子。在大爹離開客廳後，大媽坐了下來，開啟了我們的話題，從種菜、小孩的工作、孫子到她的婚姻。或許閒聊中讓她卸下心房，談起自己戰亂時的婚配，一時哽咽得說不出話來。在擦拭眼淚後，她緩緩地說出了這一段話：

我們嘛住山上，以前嘛！在家鄉父親去世得早，是阿婆（跟著孩子叫，指自己媽媽）養我長大的。在家鄉時，冬天會把地裡的樹呀、草呀砍了曬了，乾了就放了火燒，老人家會看要種什麼來分配。玉米一塊地、穀子一塊地、棉花一塊地這樣子種，自己打棉花和織布，一年一次去擺夷壩子買東西，那時候生活苦呀，只是來了

這邊開墾更苦。說真的，若是村子裡會離婚的，那一定是我排第一個，那時候大家都苦啦！但可能沒有人比我苦，精神和心裡苦嘛！如果自己的先生好的話，什麼苦就都不苦了。孩子小嘛！不能沒有我嘎！撐過來了嘎！

對於過往，蒲大媽除了苦還是苦。也就是說，對於家鄉與自己婚姻的生活皆是苦的回憶，這些記憶是她與命運的一種對話方式。所幸，孝順貼心的六個子女以及他們的後代，安慰了她老人家一輩子所承受的苦。後代子孫對蒲大媽而言，不僅是生命的延續，更是她對生命的驕傲與動力的支柱。

不少和蒲大媽相同心情的受訪者，他們認為過去雖然令人難過，但如今看著孩子們成家立業，也都深感安慰。提及住在山下的孫子們，蒲大媽彷彿突然記起什麼事，便起身通往廚房廊道上，查看正用炭火熬煮的一鍋食物，說：

這個酸木瓜豬腳，晚一點我要帶下去埔里給孫子們補一補，有這些孝順的孩子

們，我老死都不怕了，很滿足，真的。你看看我家，本來是小小的，只有前面這裡，後來我慢慢的加蓋、加蓋，我跟你說喔，現在我們家可以住上二十個人都沒問題呢，過年過節孩子們回來就熱鬧了。現在孩子要我跟他們去哪裡玩，我就跟著去玩，想開了嘎。

由於大媽們家鄉結婚的習俗大都會殺豬慶祝，然而面對這段不得已的婚姻，不少報導人以「答應我，豬在；不答應者，父母亡」的重話，來形容當時所遭遇的悲慘婚姻情況。

年近七十的藍倪大媽，是為勤勞的長者，她是目前第一代長輩中，仍然下田工作的少數者之一。幾次在田裡與她聊天，她總是一副不向命運低頭、心懷感恩的口氣說，自己還能保持健康的身體下田種菜，是上帝的恩典。如此胸懷態度，實在令人敬佩。蘭倪大媽的父親是漢人，母親是老黑。記憶中，她從小就住在雲南，祖父母是由南京到雲南和緬甸之間做銀飾生意的商人，父親不僅是傳道人也是雲南當地的土司。一日在霧社教會住所，她娓娓道來當年與大爹結婚的情況：

作夢也沒想到會來臺灣嘍！以前在家還是大小姐呢！怎麼知道在四十六年（一九五七）時大爹他們的部隊來了，那時大爹年紀大我很多嘍！我十五六歲，大爹都四十歲多歲了嘍！沒辦法就嫁了嘍！結婚時，殺豬還是我們家出的呢！後來說要逃難了，只有我們嫁給軍人的才可以一起過來嘛！其他的人也不可以，我們坐船到寮國住了兩個月，我爸爸後悔了，急著跑來要帶我回去，但是因為當時又打起來了，他只好又回去了。我離開家的時候，他有告訴我，什麼東西都可以丟，但是耶穌不可以丟，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

話中可以感受出，大媽生氣父親將她嫁給年紀與她相差很大的大爹，但仍感念父親的叮嚀，讓她至今都不敢忘記自己的信仰，並跟隨父親一樣當起傳道人。或許是當初父親的叮嚀發生了作用，蘭倪大媽雖然由土司女兒的身分，淪落至逃難的命運，但她總以「心裡有主，什麼都不怕」的堅定信仰，勇敢積極地面對人生。她笑說：

當年很有個性，生氣父親將我嫁給大爹，所以從家裡出來就身上一套衣服，父親要我帶的貴重物品他一樣也沒拿，就這樣兩手空空逃難。還好有耶穌嘍！你看看在大爹過世四年後，我可以再嫁給黃傳道，又可以再生一個孝順的女兒陪我，我很滿足，很感謝耶穌嘍！

聚落裡聲稱最年輕又漂亮的擺夷族印那大媽，在緬甸出生，九歲時就和家人到寮國，十八歲那年在泰國結婚，結婚後五個月就過來臺灣。她表示比起其他人，少了與軍隊四處流竄奔波的日子，自己在那時候比較沒受到苦，算是較幸運的。原本家境優渥，生活過得愜意，但部隊到他們的寨子後，改變了大媽的命運。說起家鄉往事，印那大媽侃侃而談：

我沒什麼逃難，我就在泰國結婚的，那時候大爹的部隊已經來泰國了嘛！我爺爺和奶奶很早已前從西雙版納到泰國去做生意，我爸爸住過寮國與緬甸，媽媽是泰國人，我有八個兄弟姊妹，有的在緬甸出生、有的在寮國出生。爸爸是村長嘛！那

時候軍隊拿著槍到村子，我們只好乖乖的煮飯給他們吃，真的就是這樣子。姊夫要我嫁給大爹囉！我爸爸、媽媽都不肯答應，都說不行嘛！但沒辦法嘍！就有一天，我從外面剛玩耍回來嘍，姐姐告訴我要當新娘，我哭一個禮拜，就這樣結婚了嘍！那個時代嘛！怎麼說呢！人的命運嘍！

說起往事，大媽談笑自如下，仍帶有一股令人說不出的無奈感。是漢人的金大媽，不像聚落裡大部分非漢民族的大媽們歷經搶婚，但卻在與家人逃難當中，為尋得游擊部隊的庇護而促成的婚姻。金大媽回憶起，當時她的父親告訴她：

我們家裡只有一個男丁，你弟弟不能去當兵，不得已就把你嫁給他了，你不要嫌人家太老囉！你看看人家，是會做生意的有錢人，有本事又當官，有什麼不好呢？現在是逃難，不是在家鄉，年輕的去打仗，你嫁了也是當寡婦，有什麼好的。

大媽表示，她一開始反抗嫁給一個不認識且年紀大她許多的人，然在父親的訓誡以及家人的安排下，完成了這門婚事。在大媽的談話中，多次強調大媽雖然年紀是年長了些，但勤勞又苦幹的個性，讓她很安慰。另外，她十分讚賞大媽重視小孩教育的態度，使得孩子們如今各個皆有不錯的成就。也因此，她能體諒戰亂中父親安排的婚事，並直說在大媽過世後仍夢見大媽，很感謝大媽對她的照顧。

無論當時邊區游擊隊成員與滇緬邊區少數民族少女結婚的目的，是為了與當地土司建立起關係，得到資源或尋得戰時的掩護，亦或在撤退回臺灣前，解除先前的禁婚戒令等因素不可否認地，利用各種與她們結婚的方式，都迫使她們放棄了原先的生活，展開另一段意想不到的的人生。從大媽們的故事發現，關於大媽們的婚姻，幾乎皆在無奈的情形下完成，而多數大媽因隨著大媽的過世，得以較無顧忌地抒發多年來藏在內心無法說出口的秘密。

農場生活

從荒山到良田

分配安置於清境農場的義民人群，抵達臺灣後，先被安排在成功嶺營區接受三個月的輔導，離開營區後，暫住在埔里鎮的埔里國小和南光國小近三個月，由分配在壽亭新村的蒙顯大隊長帶領男性義民組成的公差班，輪流上山到壽亭與博望的預定地，進行伐木、整地等工作，終於在一九六一年底進住農場。各戶配置土地的人口數，是以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口數為標準，每戶義民本人以零點七公頃為基數配墾，配偶為基數的一半，孩子再折半。配耕的土地分有鄰近住屋附近的菜地、離住家稍遠的甲地、離家需花近半小時的乙地以及離住家半小時以上的丙地等四種（宋光宇 1982: 753）。

依照聚落中報導人的說法，分配的土地完全用抽籤的方法，決定各家所得的土地。由於

壽亭與博望所處的海拔不同，兩村在農作物的種植收成初期有很大的差異。壽亭居民所配墾的土地，海拔較博望的低些，溫度較高，雨量較不足，蔬果收成大不如高海拔的博望新村。居民表示，尤其是位於往廬山溫泉之雲龍橋上方的丙地，由於水源不易取得，無法種植作物，所以後來村民與場部溝通後，於一九七〇年左右，場部讓壽亭村民的丙地，換至青青草原再上去一點的土地，又因早期大家都種蘋果，所以稱此地為蘋果園。

隔年分配土地後，義民人群就此展開農墾生活，雖說安置初期有來自聯合國經費的補助，但艱辛的拓墾一開始並非想像中的順利。目前遷居霧社的蘭倪大媽，由於放領後的田地，早年已被孩子們全數變賣掉。近年她向人租地，並和商人契作種植紅生菜等作物。雖然年近七十的她，每天一早，仍從霧社坐車到壽亭的地裡耕作，她指著由石頭堆疊砌成的梯田邊坡，心疼的說：

這石頭都是我們一個個挖、一個個疊起來的，疊不好是會垮的嘍！那時候剛到農場時已經快過年了，過完年嘛，場部載了一卡車的鋤頭來，一人分三把，我在家

鄉連鋤頭都沒看過，還問大爹這是做什麼用的？

她感慨的表示，沒想到這鋤頭一用就是一輩子。說起初來清境的情況，大媽們大多有相同的心境。家住博望新村跟著女兒一起經營民宿的曉邦大媽回憶道：

自己要種的地是自己一鋤一鋤的挖出來，你大爹嘛以前是馬幫生意人，沒種過田，有一天去挖地，鋤頭挖斷了，你大爹就說要回家了，當時我很生氣的跟大爹說為什麼要回家？我說嘛！怎麼辦，再苦為了小孩也是要挖嘎！你看，老了毛病出來了，這個骨頭都不行了嘎。

家住博望新村美麗又能幹的印那大媽，想起那段墾拓初期的生活，紅著眼眶這樣說：

以前在家鄉嘛！本來過得好好的，煮飯也輪不到我，打仗嘛！不得已的嫁人，

沒想到臺灣更苦。剛來的時候，挖地、挑水，很苦呀！我們幾個人（幾個大媽）在地裡抱著痛哭，還說想一起逃回家去。那時候，自己的地種好了，就幫人家種，有時候也還工給人家。唉呀！苦死了！

由於大媽們原本在家鄉的耕作方式大多以燒墾和採集進行，沒見過鋤頭是大部分義民妻眷的共同經驗；另外，在滇緬戰場習慣拿槍作戰的大爹們，面對山上墾拓生活也不是那麼適應。因此，農墾初期，得靠自己的雙手將滿山荒野變成良田的經歷，在大家的記憶裡，就是一個「苦」字。

大致來說，安置在清境農場的義民人群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無不咬緊牙根，一鋤一鋤努力地將荒山野嶺開墾成梯田，並在農場的輔導下種植蔬果，以及畜養雞、豬等家畜，並製作木炭來補貼家用。在種種的努力下，使生活漸漸地有了起色。

當初安置清境農場的義民皆有妻眷身份，農場採取個別農墾的方式輔導，也就是以戶為單位分耕經營，但仍全體統一運銷（陳穎立 2007: 56）。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間，連續



1

2

1 大媽正揹著竹簍子要往田裡去。2 大媽在田裡，訴說昔日開拓荒地成良田的辛苦過程。

發生包商倒債事件，場員損失慘重，叫苦連天，因而不再生依賴場部的安排，自行與平地上山來的菜販包商訂約，以爭取較有保障的收款方式；另外，後幾年平地遭逢颱風和水患，平地蔬菜災情慘重，清境農場安然無恙，還因一時的菜價飆漲，發了可觀的「颱風財」；緊接著，大約於一九七九年左右，臺灣開放溫帶水果進口後，影響到場員種植的蘋果收益，因而迫使不少人紛紛改種起蔬菜，其中以高麗菜為最大宗（宋光宇 1982: 783-785）。

每當夏季來臨時，即進入高麗菜收成期，遠從南部來的菜商會上山與村人討論高麗菜收成的條件，村民便開始忙著盤算砍菜的時間和張羅砍菜的工人。這期間，蜿蜒的山路上，常可看到載滿著一筐筐高麗菜的大卡車，南北往返奔馳。就一九七〇年代末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而言，夏季蔬菜中的高麗菜幾乎成為義民家戶中的主要收入。若說高麗菜象徵清境義民人羣初嚐苦盡甘來，漸入佳境的滋味，一點都不為過。

通常於播種以及採收時節，都十分需要人手。據村民表示，通常壽亭會請鄰近的春陽部落原住民，而博望會請離他們田地較近的平靜、合作部落原住民來幫忙。另外，遠在城市就學的第二代，於暑假期間，也得返鄉參與家中的農事工作。博望新村的武家大姐皺起眉頭回

憶說：

大人嘛一大早就到田地裡忙，家裡什麼家事都要做，什麼洗衣服啦、照顧弟弟妹妹，我很小的時候就要開始煮飯囉！那時還小還站在小椅子上炒菜呢，而且那時還是用木炭煮，還常常把飯煮焦了。

家住博望新村的順麗，同樣是家裡的長女，聽了武家大姊的這番話有感而發：「做的家事可多呢！煮飯是固定的家事之一，上學期間還得幫弟妹們準備便當呢！飯煮焦了是常有的事。」分擔家務可以說是第二代普遍的經驗，主要是父母親為一家人的生計，忙於地裡的作物生產，家戶中較年長的小孩自然得分擔家務。就如生性樂觀、家住壽亭新村的曼菊，談起從小就有做不完的家事，並不以為意，甚至津津樂道起田裡的工作：

平常在地裡除草什麼的是還好，不急嘛！但碰到砍菜收成時，你家要砍、我家

要砍，工人有時候根本都不夠，我們小孩也只好下去砍囉！天還沒亮，就拿著菜刀去地裡，動作可是要快呢！因為要趕著讓菜商的車運下山，所以有時都砍得很緊張，我們很調皮，邊砍還邊唱歌跳舞呢！

不少第二代男性表示，他們不單是煮飯高手，從除草、整地、澆水和砍菜等農事，一樣也沒少做。有些人還提到，讓他們覺得最辛苦的是，在陡峭的梯田裡，學原住民將高麗菜摺上來的經驗。「賣工」、「砍菜」或「揸菜」的經驗，⁵對於自幼即參與家務農事的第二代而言，這些經歷成為外地朋友、研究者來訪，或是平時自己人群聚時的聊天話題之一。

百合花卉的美麗與哀愁

種植高麗菜或其他高山蔬菜確實改善了生活，但居民普遍認為，務農本身就是很辛苦的工作，大部分長輩並不會刻意要求孩子們留在山上務農，加上第二代有機會到外地求學或工

作後，對留在山上的農耕生活，興趣並不高，紛紛往平地或都市發展。

然而，一九八六年左右，種苗公司開始推廣短期作物的溫帶花卉，其高經濟效益改變了義民聚落中第一代對務農消極的看法，不少人積極鼓勵年輕人返鄉種花，甚至也吸引了外地人上山租地種植花卉。花卉生產之推廣，讓不少居民轉作，改變了十多年來以種植高麗菜、水蜜桃和蘋果等為主的習慣。雖然，花卉生產之高資本與高風險的情形，讓不少居民卻步，但從事花卉生產的家戶，在義民人群務農的比例中仍佔多數。

二〇一〇年的研究期間，我做了務農家戶的初略調查，壽亭新村從事農業的村民約有八人，其中四人以蔬菜為主，三人同時種植蔬菜與百合花，僅一人單一種植百合；另有第一代一位大媽種當歸和其他蔬菜，販售給當地的小販或餐廳。定遠新村約有八人以種百合為主業，單種蔬菜的極少，第一代平蘭大媽專門種植當歸販售給當地的小販或餐廳。博望新村約有十三個人單一種植百合，另有三人左右種植當歸或種少量的蔬菜，由自己販售或賣給其他商家。從以上的調查的數據中，我們發現務農不再是義民人群唯一的選擇。

家住定遠為大同園藝合作社之理事長的姚姓花農表示，壽亭新村的村民是率先嘗試花卉

的種植，定遠與博望居民見其經濟效益高於蔬菜，漸漸地也跟著種植花卉。原本最慢且最少人種植花卉的博望新村，曾一度高達三十來戶參與百合花卉生產行列。於一九九〇年時，三個義民新村花農，成立隸屬仁愛鄉農會的「清境花卉產銷班」（村民習稱花班）。然花班運轉一段時間後，花農認為農會給予花班的補助，相較於鄰近原住民花班來得少，對此，三個新村花農呈現出兩種不同的作法。

約自一九九九年左右，壽亭與定遠新村之花農，決定另組與農會位階相等的「大同園藝生產合作社」（簡稱大同園藝），對象為從霧社到幼獅的農民，其中包括蔬菜與花卉兩班，目前種植百合花的社員約有十五人。

反觀博望新村花農，他們雖也認同農會對於同鄉原住民部落與非原住民部落之花班補助實有所偏袒，但仍然覺得花班隸屬在農會底下比較妥當，並認為花班成員，以村內人為主較利於溝通與運作，所以不加入大同園藝，而決定另組花班。博望新村內部花農眾多，基於理念的不同，由村人自組之花班有數個之多，如：松崗花班、奇萊花班與文明花班；除此之外，於附近之外地人自組的東勢花班。其中以松崗花班為最大班，班員約有十八人。

清境地區由於地形天候的自然環境因素，夏季是最忙碌的農作生產期，冬季則因天氣過冷，無法栽種，屬休耕期。通常花班會在休耕期間舉辦旅行之類的活動，除了可讓花班成員放鬆外，並有助於彼此間的感情聯繫。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花班活動大多以自身成員為主，鮮少邀請其他花班成員參加，不像拓墾期三個義民新村之第一代於農閒時，不僅與同村左鄰右舍熱絡相邀打牌、做菜、唱歌或飲酒等休閒娛樂，上、下村之村民也一樣頻繁往來。

整體而言，「松崗花班」與「大同園藝」為義民聚落最主要之花班組織。然而，在以花班為主體的運作下，卻劃分了上清境與下清境之人群範圍，亦即「博望」與「壽亭」（包含定遠）之人群劃分。無形間讓「博望」與「壽亭」之上、下村民，少了昔日熱絡往來的氛圍，而多了一份疏離感。

臺灣夏季平地溫度太高，不宜百合花卉生長，以致於無花可收，反觀氣溫年平均十六度的清境地區，夏季所生產的百合花卉正好與平地產期錯開。目前清境地區種植百合花卉面積，大約在五十公頃上下，達一百萬把以上之年產量⁶，於花卉市場上佔有一席重要的角色。一般來說，清境地區所種植的百合花卉大約只經三個月的培養期即可收成，收成期從每年的五

月下旬開始到十一月底為止，將近有六個月的時間。

花農通常會將花卉種球分批來種，而花卉收成約需六十到一百天的生長時間。壽亭與定遠兩新村的花農，會在過農曆年前後將第一批種球種下，六、七月種第二批，九月份再種最後一批。這樣分批輪作的目的，最主要自五月中後，即可開始剪花至近十二月才結束。反觀博望新村花農，最早的收成花期也要到五月底，而最後一批的種植時間，必須趕在八月二十日前埋下種球，通常在十一月左右就沒有花可剪了，所以僅能種兩輪百合花。換句話說，花農會依海拔的不同來決定一年栽種兩或三輪，以達到收成期「天天有花剪，天天有收入」的原則下，在有限的土地上創造最高的生產值。

目前義民聚落中從事花卉生產，多是第二代兄弟姊妹分家後各種各的，少有長輩與全家兄弟姊妹一起合種的情形。在整個種植生產過程中，花農為了掌控人力成本的支出，通常自行負責所有照料花卉工作，非必要才請人。雖有極少數人依賴長工打點花卉生產的情形，但這種情形在義民新村花農中是少有的。

從栽種的程序而言，花農大多在最後一次收成過後，也就是約十一月底左右，即開始一

方面整地，一方面訂購進口的低溫種球做預備，於農曆年前後埋下種球。這段期間算是花農較輕鬆的時期，人力的調配也相對較為容易，平日私下交情較好的花農，會彼此相互幫工或換工的情形。然一旦進入五月中旬乃至整個夏季，即是花農最忙碌的收成期，這時人力需求對花農家戶來說十分重要。夏季不僅是是百合花卉的收成期，同時也是清境地區觀光人潮最高峰的時節，使得開民宿、餐廳或相關行業的居民與花農家戶在「忙不贏」的情況下，大多無法彼此協助，讓人力的調配呈緊繃狀態。通常產量大的花農除了會向種得少的花農求援外，就得靠放暑假回山上打工的第三代來幫忙，整個夏季，花農們從早忙到午夜是習以為常的事。

夏季裡除了農事讓花農「忙不贏」外，每日的花價也讓花農「煩不贏」。由於花農所種植的花卉經由產銷班共同運輸的方式，運至花市進行花卉交易拍賣，花卉價格會依市場供需而起伏，花農們每天的心情也因當天花價的高低而寫在臉上。二〇一〇年的冬天，於定遠新村駱姓家戶中烤火時，在場的姚姓花農開玩笑地對我說：「你若是夏天來找我問事情的話，我一定用掃把將你掃出去。」雖是一席玩笑話，卻深刻道出花農，一則為花圃的繁重工作而終日勞累，一則為每日的花價起伏而憂慮的夏季生活寫照。

從平靜部落嫁給博望新村二代的麗秀就表示，他們夫妻去年約種十萬株的百合花，一株十七元的球根來說，就要一百多萬元的資金投入，但這還不包括肥料和工資。另外，姚姓花農表示，由於他的土地地質惡化，目前所種植的百合花不是直接種在地裡，而都以介質的方式種植，以致成本多出許多。高資金的投入不僅是花農的最大負擔，也是部分村民不敢貿然投入的原因，也因此各個花農無不絞盡腦汁，想盡辦法降低成本來提高收入。

部分花農會養「二代球」，讓成本多少可以省一點。也就說保留當年度已開過花的百合球根，作為次年種植時的種球。但有些花農對此認為，用「二代球」未必是保險的方法，因為若要用「二代球」作為來年的種球，那也需要花精神去養，才能讓花長得好，甚至有不可預期的風險。

除了嘗試降低成本的方法外，最早種植花卉的壽亭新村花農，大多不再全部種植百合花卉，而採取部分的地種百合花，其他的地分配種高麗菜、巴西利生菜、紅生菜或豌豆苗等，輪種多元作物，以此分散風險。另外，處於高海拔的博望新村花農，近年來開始向鄰近原住民租較低海拔的地來種，就是為了讓花期拉長，而增加收入。

百合花卉屬多年生草本球根植物，屬嬌貴作物，除需搭網架建設簡易溫室的基本配備外，從決定下單購買種球、除草、整地、消毒、種植、施肥、噴藥、疏苞、採收以及包裝到運銷等過程，不僅要有足夠的資金挹入，層層環節更需要懂得栽種技術與嚴密的管理，才能種出品質優良的百合花卉。

種植近二十萬棵百合的松崗花班班長梁添興，稱上是清境地區種植數量數一數二的大戶，夫婦兩人全心全意從事百合花卉生產，由於投入可觀的資金，對於花卉生產的管理秉持十分嚴謹的態度。二〇一〇年九月初的一個晚上，有機會在他的包裝場看他們包裝百合的情形，在旁的陸明億感嘆當季的百合沒有獲利，梁添興慎重地道出可能在管理花卉上的疏失。由於陸明億平時大部分時間忙於經營餐廳，花卉的栽種事宜大多交代長工處理，對此，注重管理的梁添興對他提出忠告及看法：

你管理不好，打藥一定要按時間打，不能拖拖拉拉的，要有順序，在人力上的分配和調動很重要，不能全部的人都集中做同樣的事情，就像剪花時只顧著剪花，

而其它的工作又擱著，這樣是不行的，這樣很容易事情該做的都遺漏的，到時候再補，效果就不行了，所以像我自己有時打藥打到晚上九點十點，沒辦法，一定要做完這個程序。不要小看這小小鐵皮搭的包裝室，一年進出就是近千萬資金的運轉，我就是以一份事業的態度來做。

然嚴謹的管理法則，卻仍難逃面對天災時的窘境。原為博望花農的洪富勝歷經天災打擊後，藉由對甲蟲的熱愛找回自信，並親手打造令遊客驚嘆的「蟲蟲館」，後來慢慢地轉型成為解說員以及投入跑車行業。他提到九二一地震後，清境地區雖無重大災害，但整個中埔公路因損毀而遲遲不通，讓他們的花就在田裡謝掉，那時期有不少人因此破產，而一蹶不振，以致於地方流傳著「沒聽說種花的賺錢，倒是聽過種花的跑路。」之說法。

家住壽亭新村聰慧且做事認真的美虹大媽，因年紀大了不再從事耕作，近年來全心支持兒女經營民宿以及餐廳，對種菜種花十分有經驗的她，就感嘆地提到：

不管種什麼都要認真也要靠運氣，種菜要賺錢也是要會看時機喔！像是夏天，平地若風調雨順，市場菜量供應充足，山上的菜就賤賣囉！平地遇上颱風天沒菜了就有機會發個颱風財嘎！種花，拍賣的價錢好不好我們不能決定，要看市場拍賣，運氣不好呢！雖然種得很漂亮，碰上市場價錢很不好，也會血本無歸嘎！運氣好遇到好價錢，可能把以前賠的錢全部賺回來。現在觀光客多，小孩也不種了，他們就說想做做生意好了。

我發現不管種的是水果、高麗菜或百合花卉，儘管有遇到好價錢的機會，但村民大多認為從事農作是看天吃飯的行業，總令他們深感不安穩，尤其在一般村民眼中「種植百合花卉就像在賭博一樣」，讓他們既期待又害怕。



1

2

1 把握下種球的時機，關係著百合花卉收成的時間。2 百合花田是招待客人的場所之一。

蘋果樹變城堡

清境農場蜿蜒的公路上，放眼盡是歐洲夢幻城堡般的民宿建築，其充滿異國氛圍的招牌，從「比佛利」、「盧森堡」、「瑞典假期」、「挪威森林」等歐美渡假勝地名稱到「美斯樂」、「水擺夷」、「雲南風情」、「滇緬的家」、「麗江」、「西雙版納」等滇緬邊區之名稱，不僅吸引人且令人充滿想像。

二〇一一年初，我在博望新村武大媽自家的民宿裡閒聊時，讚嘆武家三棟精緻的民宿建築，大媽與其女兒因一時興起，從牆上的櫃子裡拿出一瓶酒說：「這是自釀的蘋果酒。」當我問起哪來的蘋果時，大媽指著多年前用高粱酒瓶裝的蘋果酒，激動的說著：

蘋果？就是這裡了嘛！你腳上踩著的這裡就是了嘛！以前都是蘋果園，都蓋民宿了嘛！沒辦法啊！蘋果賺不了錢，都砍光了。現在他們兄弟姊妹就做民宿和種花，我幫著做一點，早上整理房間，忙完就到田裡剪花，每天都忙不贏嘍。

自一九九〇年代土地放領政策實施後的土地私有化，部分居民認為蔬果之經濟效益不及於賣土地所帶來的財富快速，使得土地買賣成為清境地區最顯著的經濟活動，年輕一輩將土地轉換成貨幣後，跑往山下投資或享受現代生活者大有人在。勤奮的武家將靠近路邊的地蓋民宿，又將交通不便的地安排種花，不單是義民人群口中農業與商業兼顧的模範，也代表了村民由農轉商的趨勢。

身為松崗花班班長又兼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梁添興，夫妻倆有忙不完的花圃工作，他就表示：

當初問我老婆是否要做生意，她說她比較喜歡平靜的生活，所以我們選擇種花。但光我和我太太兩家就四個兄弟姊妹從事觀光產業，而我們拿什麼跟人家比，所以說，我想我們自己要將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特色表現出來，這樣才能跟人家區隔，觀光客才會來欣賞我們，我們一定要從傳統的農業走向與觀光結合，打造出一個新的文化產業，而且可以讓下一代傳承下去，不能說這只是我想法，畢竟這是一個趨

勢。

武家並不是唯一砍掉蘋果樹的家戶，村民口中的蘋果園、高麗菜田，早已被一棟棟的民宿建築所取代。活躍的土地買賣，不僅有人因嚮往清境優美之環境，而上山買地築舍定居；重要的是，此地區的商機，更是吸引了不少資本家進駐，以致於民間觀光業在當地悄然展開。

為因應不斷蜂擁而至的旅遊人潮，民間經營的觀光業中以旅宿業為主。尤其在九二一地震後，資本家與在地居民組成「清境觀光發展促進會」努力促銷，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一度引發不少從外地上山買地的商人進駐清境地區，此現象被稱為清境「新移民」。在「新移民」的熱門話題傳播下，讓清境民宿知名度大增，由九二一地震前的十六家，增至約有一百二十一家之多⁸。如今站在清境農場任何一角落上，如雨後春筍夢幻般地冒出一棟棟，宛如皇家貴族般的城堡，在交通、住宿、景色宜人等多方面令人舒適的條件下，讓遊客「神遊」於如歐洲鄉間的環境想像裡，盡情享受觀光的樂趣。

雖然，日益蓬勃的觀光發展讓居民看到生機，但這些豪華氣派的民宿，與三個義民新村

之老舊樣貌形成強烈的對比。村民中有能力蓋像武家這麼漂亮的民宿者，畢竟是少數。在眾多的民宿建築群裡，僅約二十戶是由義民所經營⁹，大多都是外來的資本家。由於義民沒有像外來資本家有雄厚的資金，可以打造美輪美奐的民宿，若想從事觀光行業，不是向銀行貸款來籌建民宿，就是僅能賣起小吃與自家農產品。因此，發展協會成員與一些從商的村民，想盡辦法藉由辦活動來推廣地方文化，希望能打造出獨特的文化特色，來吸引觀光客以及對抗外來投資者。

當一大早陽光灑在博望新村的「松崗大街」時，花農已開著紅色板車或藍色小發財車，將前一天忙至深夜在包裝場包好的百合花束「拉」到松崗花班，好趕上早班的貨運載往花市拍賣市場。上午十點鐘不到，松崗大街上的商家已開始張羅生意上之所需物品。儘管松崗大街之觀光熱潮，迥然不同於壽亭與定遠兩新村的安靜，田裡的城堡也不及外來資本家所建的華麗，但不管如何，義民人群後裔從事民宿、開餐廳、跑車趟、廚師或服務員等有關觀光行業的村民，確實是越來越多了。

只剩紅白帖

早期，義民人群安置農場後，為農場輔導的對象，雙方為「場部」與「場員」的關係，雖說義民們已不在軍隊，但這樣的關係猶如長官與部屬之階層從屬。從初入農場時的伐木、築屋、分地、墾地與農作輔導等，場部一方面扮演輔導義民人群生活適應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政治立場的傳聲筒。過去自治村時期，各新村設有村長一人，其主要的功能在於傳達場方的訊息，以及協助場方對場員的管理。幾位村民透露當有選舉時：「黨部交代場部選誰，場部就會交代村長回來轉達給村民，要把票投給哪一位，而他們也一定不會跑票。」在當時，「團結」是義民人群引以為傲的政治立場表現。然而，隨著臺灣的社會變遷，以及九〇年代之後義民與場部的關係發生變化，第二代對於政治立場開始有新的想法：「誰比較對我們有利，我們就支持誰。」而不再像上一代只是聽場部的命令行事。

一九八〇年代以後，臺灣社會運動蓬勃激烈，退輔會制度也成為被鞭撻的對象，經過數年的抗爭，「開發農地放領辦法」於一九八九年元月公佈實施，實際的放領從一九九一年開

始分梯辦理，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左右大抵完成，義民自此擁有私有土地，不再屬於農場的一份子，回歸一般行政系統（李紀平 1998: 26；陳穎立 2007: 49-61）。二〇〇〇年一月，清境農場對於場員的輔導業務，移轉給南投榮民服務處，農場數十年來的輔導工作，就此劃下句點。

國家政策帶來了義民們擁有私有土地的福利，卻因當時土地放領時的爭議，導致場部與場員之間交惡；加上義民人群原普遍對農場存有深刻的感情，以致對於土地放領後農場「劃清界線」與「依法行政」的原則，大多難以理解與接受，甚至呈現出矛盾的情緒。博望新村一位經營餐廳的義民第二代報導人說，他當年拿餐廳的名字去申請登記註冊，不料被農場告上法院，主要原因就是他用了「清境」二字。由於農場表示「清境」是屬於場方的智慧財產，不可以盜用，讓這位報導人覺得不可思議，也感到很感慨。最後他贏了這場官司，可以用「清境」二字在其招牌上。

第一代長輩對這類的事有更強烈的感受。壽亭的美虹大媽因家裡的新房蓋在以前的豬圈土地上，輾轉遭人檢舉進而被告上法院。村民表示，豬圈為當初農場蓋給村人使用的，但在

土地放領時，豬圈土地產權並沒有劃給他們，也就是說，豬圈仍為農場的財產，但與農場有一默契：可在廢墟的豬圈土地上種植蔬菜，但不可建築私人房舍。由於二〇一〇年敗訴後，同年七月由農場代為執行拆除任務，惹得她哽咽的對她說：

現在都不一樣了，沒感情了。以前什麼什麼的，要我們做什麼，我們都很配合，都沒有用了。你看這豬圈是他們當初蓋給我們用的嘛！現在我在上面蓋房子嘛！花了好多錢呢！為什麼我蓋的時候他不來說呢？那時他可以來說呀！我都住那麼多年了，說什麼依法行事，要拆就拆了，一點都沒為我們想。

當拆屋風波鬧得滿山風雨之際，一個晴朗的星期天早晨，幾位大媽們在定遠新村沈大媽家做禮拜，做完禮拜後有感而發：

現在跟我們感情都沒啦！現在土地有一點問題他們就會告我們，說什麼我們侵

估啦！奇怪，豬圈以前就是農場給我們用的嘛！以前我們多團結呀！只要上面交代一聲什麼雙十節啦、過年啦、清明節啦、我們都會去場部唱國歌、一鞠躬哩！場部的長官也會發五十元紅包給我們呢！唉！現在什麼都變了啦！沒什麼感情了。

土地放領政策實施後，一方面使得義民脫離場部，成為獨立的自耕農；另一方面，昔日位於法律模糊界線的土地，如豬圈，在場部「依法行事」的執行下不得越界，使得近年來農場與村民逐漸疏離的狀態越演越烈。不少村人感嘆：「現在我們跟農場的關係只剩下紅白帖了。」場方目前幾乎僅以保持參與村人的婚喪喜慶或廟會等活動，來維持雙方的關係。

整體而言，土地放領政策不僅讓義民與場部的關係發生重大改變，也使得這個地區的經濟生態漸而轉以觀光事業為導向。其實早在一九八五年，國民賓館的落成，即是場部開始發展觀光事業的關鍵（陳穎立 2007: 91）。隨後，農場更積極推出「技術經營合作」，透過招標的方式與農場人群以外的對象合作，並完全轉型為成為觀光農場（孟智慧 2004: 32）。再者，周遭農場人群擁有私人土地後，因土地買賣造成「新移民」與外來資本家的進駐，觀光

業蜂起，尤其以民宿業為盛，使得越來越多義民人群不再以農業為主要生計，而逐漸投入觀光業，該地區自此產生景觀與人文的驟變，並使得農場人群與新移民間的競爭態勢悄然產生，面對日益蜂擁的觀光人潮，清境已不再清靜了。

重返故鄉

自從大陸開放探親以及觀光以來，聚落裡不分男女，長輩們大多有返鄉的經驗。在中國人傳統的觀念裡，「家」象徵著根以及飲水思源的意涵，就如博望的林



「秋祭」儀式維繫著義民人群與農場的關係。

大爹表示在幾次的返鄉時，早已經安排要落土歸根的準備。聚落早期以男性長輩返鄉居多，第二代年輕人陪父親返回老家的也不少，但大多表示僅陪父親了一個回家的心願，對於父親的家鄉並無太多感覺與瞭解。原本因父親返鄉後恢復聯繫的家鄉親友，不少也隨著大爹的去世而不再聯絡或往來。另第二代在經濟許可下，結伴去家鄉雲南走走看看的也不在少數。大部分人去的是名勝風景區如九寨溝、西雙版納、麗江等地區，基本上，談不上對家鄉的情感，畢竟這些地區並非長者口中的家。儘管對「家鄉」無法有切確的想像，但由於近年來清境觀光發展的需求，倒也有一些人積極地前往「家鄉」——雲南尋找「家鄉文化」，並試圖將家鄉文化帶回來。

此外，這幾年有些第一代女性趁回家鄉泰北、緬甸或雲南時，帶回一些衣飾等物品，也有人帶回家鄉的佛祖、佛像、佛寺祭拜儀式的錄影帶、錄音帶、宗教器物、衣飾、少數民族娃娃、背包、布等。有的將其佈置於客廳，等客人來時展示一番；有的佈置於自家經營的民宿或餐廳中，除添增民族氣氛外，還可成為販售的商品。在聚落裡常可見到這些紀念品擺在家中，也可看到村人播放回家祭祖的錄影帶，以及一些家鄉流行歌謠或舞蹈之類的節目卡

帶。無論大媽們從家鄉帶回些什麼，無非都是在傳達家鄉的點點滴滴，重要的是，她們也藉由帶回的物品與家鄉緊密地連結。

聞到花香的味道

伊芝大媽平日在女兒所經營的民宿幫忙，她表示十年前與幾位同鄉回去過一次，由於太久沒回過家鄉，既使已在歸鄉途中，仍不敢相信還真有這一天。當接近家鄉的路程中，看到昔日竹林景色、聞到過去熟悉的花香時，再也忍不住地流下淚來，因為她知道，是家鄉了。她回憶當時返鄉途中的情景：

剛到這裡的時候，常常想他們過得好不好，十年前回家過一次，那時是刀媽媽的女兒陪我們幾個人回去嘛！從清菜到美賽，坐火車的路上，夜半到天亮，我都不敢睡，眼睛都是張開著，後來我聞到花香的味道，只有家鄉的山上有那種花，臺灣

沒有，是家鄉的味道，看到竹林，我的眼淚就流了下來，因為我知道，是家鄉了嘛！
快要到家了嘎！

雖然第一次返鄉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但伊芝大媽回想當時的心情，彷彿如昨日光景。花香代表著家鄉的味道，同時也是大媽對家鄉的記憶，更是喚醒她對返鄉的真實感。依據她的記憶，臺灣並沒有這種花香，而當火車慢慢接近家鄉時，山上飄散而來的花香，對家鄉的熟悉與真實感油然而生，多年來想家、念家的情緒終於在聞到花香時爆發。大媽表示家人一直住在難民村，自己種自己吃，但由於身分的關係不能到泰國都市工作，物質生活上較為匱乏，因此，多年來一直和家人保持聯絡及提供經濟上的協助。

在社區舉辦火把節前兩天，伊芝大媽在女兒以及另兩位大媽的陪同下再次返回故鄉。當我依約再次拜訪大媽時，她一身穿戴這次返鄉時所買的新衣裳與首飾，並拿出回家時所拍的照片開心地說：

最後一趟了嘍！現在家裡就剩弟弟了，擔心弟弟嘛！他也一直打電話來，回去這一次，不再回去囉！我給弟弟一些買地的錢，蓋房子的錢，我告訴他，我老囉！買了地要他認真種，叫他對自己的太太、小孩好，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樣。我女兒美惠不放心嘛！跟著我一起去，還有屏東那邊介紹的導遊幫我們翻譯，美惠怕聽不懂我們的話還特地邀蘭寬大媽一起去，蘭寬大媽的小女兒和住定遠的平蘭大媽也一起去囉！

從大媽的言談間可以發現，她對家人有著深切的擔憂與掛念。她認為自己年紀大了，能夠照顧留在家鄉家人的時間也有限，希望這一趟買地和建房子的計畫，能徹底解決家人的經濟問題，好讓遠在他鄉的她能夠真正安心。貼心的女兒由於擔心大媽被騙，不僅一路相隨，並邀同村兩位大媽前行，以便解決語言不通的情形。由於伊芝大媽的弟弟沒有泰國身分證，無法離開泰國政府所規定的活動範圍，所以一行人風塵僕僕到了泰國清邁後，便轉往清萊府的美賽與弟弟一家人會合見面。大媽緊接著說：

弟弟不能到太遠的地方嘛！我們早上就在美賽的教會見面，弟弟、弟媳還有他一個兒子都來了。我們在那邊時，平蘭大媽叫人去找住在緬甸大其力的弟弟，沒想到他弟弟最要好的朋友來說，他弟弟跟朋友去山上打獵時，被朋友誤以為是熊打死了，死了一年了嘍！蘭霓大媽的親戚也來了七、八個，還有松崗（博望）蘭果大媽的弟弟也跟著來，加一加有三十多個人，我們在清萊一家飯店，在那裡不抓嘍！開了四桌嘍！我們在一家餐廳吃飯、再帶弟弟他們一家人去買衣服。

大媽強調此趟為最後一次返鄉，因此接受弟弟的邀請「回家」一趟。弟弟從家鄉逃難出來後，就住在現在美賽縣的茶房村，所以嚴格說起來，茶房村的家並不是大媽昔日真正居住的村落，但是大媽認為弟弟的家就是自己的家了。在大媽返鄉前，弟弟向人借了些錢申請了電，為大媽的歸鄉做了準備，然而與伊芝大媽隨行的女兒不習慣傳統的竹屋，以致此行並未留宿茶房村。但不管有無在弟弟的住所住下來，對大媽而言，都是「回家」一趟了。她說：

第一次回去的時候沒有過來這裡，這一次弟弟一直要我回去一趟嘍！他是說去家裡面，他要殺豬、請人家來唱歌、跳舞嘛！我們是要他不要浪費、炫耀嘍！弟弟要我們住下來，但是我女兒不敢住，她說那個竹子有縫隙，她會怕，後來就不住了嘛！我是很想住嘍！我們以前就是住這種竹屋嘍！我覺得很漂亮嘍！這次給他錢，可以蓋水泥的，比較堅固嘍！

擺得長長的飯與菜

壽亭的藍賀大媽和鄰居沈大媽皆表示回過家鄉，但由於那時緬甸政治情勢緊張，一般外國人不方便入境，因此她們的經驗與大多人的經驗是一樣的，一邊花錢請當地人進入指定的地方去找人，一邊得待在泰國與緬甸邊界鎮上的旅店或私人的住所等待消息。如此一來一往，總要耗上不少時日。幸運者找到家人團聚；不幸運者，只好等待下次返鄉時，再找機會請人打聽。沈大媽拿著照片說：

這幾年來我回去好幾趟了，我每年都回去一趟嘍！女兒陪我去過，這張嘛是我回去泰國的寺廟拜拜，每一次我都會去這廟拜拜。這張嘛是我嫂嫂囉！我也是在泰國這邊住在認識的人家裡等著嘍！第一次也是請人家去找，找到了嘛！人家帶來這邊嘍！他們說邊境很亂，我也是怕囉！怕人家會搶嘛！不敢去嘍！每次都在這邊等著嘍！家裡也沒什麼人了嘍！爸爸媽媽都死了，哥哥也死了，現在就嫂嫂和姪子他們了，我有空還是會再去看看他們嘍！

沈大媽一方面因返鄉機會完成與家人見面的心願；另一方面藉由到泰國寺廟潛心禮佛，來彌補多年來在心靈上的空虛。而身為基督徒的藍賀大媽，雖無須到寺廟參佛的必要，但思鄉之情仍溢於表，她說：

回去了嘛！不能過去緬甸，我在泰國這邊住在私人的家裡，給他們七百元錢買菜、買酒嘛！再叫人家去找我哥哥他們，找很久嘛！第一趟沒找到，我不死心，再

請人去一趟，後來找到了！我哥哥、我嫂嫂、我的姪子，很多人嘍！來了二十幾個有囉！我給他們每一個人一百元嘛！他們走邊界好多天才到的，我買了很多菜，給他們煮飯、煮菜，用那個紙板鋪在地上，從這裡到那裡那麼長的擺著，吃完了飯，他們又要趕回去囉！也沒辦法，不能多留，我是很想再回去一次嘍！

由藍賀大媽的返鄉經驗中，我們可以看見思鄉情切的她，即使第一趟找不到人，仍不放棄可以見到家人一面的希望。礙於當時緬甸政治的關係，幾十年不見的家人，為了見這一面得走上好幾日的邊境小路，大媽則在邊境的這邊，焦急地等待。儘管等了十年才見面，還是僅僅半天的時間，她依然堅持要親自為家人做一頓飯菜，因為這一頓擺得長長的飯與菜，代表了對家人深深的思念與心意。

不要忘記我們，帶歌回去聽

我看你這樣穿，就知道你們過得很好，像大官一樣。

你們不要回去，讓我們來服侍你們。

從出生下來，沒看過這麼好命的，

沒米、沒菜，我去種，

你們來的話，煮十鍋飯都沒問題。

第一次進到印那大媽的小吃店時，即聽到這首歌曲；之後，在大媽埔里的家中作客時，她再次播放，經由大媽的解釋才瞭解其中的大意，並得知這是印那大媽幾乎每天必聽的家鄉音樂。

家住博望新村的印那大媽，把握觀光商機，在自家開了一家名為「西雙版納」的米乾小



1

2

1 大媽在泰緬邊境的村落，參觀弟弟一家人住的竹屋。2 三位大媽在女兒的陪伴下，如願重返家鄉探望家人。

（翻拍自大媽提供照片）

吃店，將原本的客廳放了兩張木造的休閒座位，當成客人吃東西的地方。另有一牆面設有架子，擺上她多次從雲南西雙版納、泰國、緬甸或寮國那邊帶回來深具異國風情的藝品，其中包括代表少數民族的小娃娃、傘、樂器、絲巾、包包、圖畫、帽子等多樣具民俗風味的物品。大媽笑說：

已經數不清楚回泰國幾次了，家鄉的家人都過得很好。我有時候自己回去，我一個人回去搭車、搭飛機沒問題，有時候人家要我帶她們回去嘎！我跟村子裡的一些大媽不一樣，我家人還在原來的地方，我在美賽還有兩分地呢！這些東西都是我每次回去時順便回來賣的嘎！來這裡玩的大學生很喜歡我帶回來的包包和披巾嘎！

或許因祖父母就是從雲南到泰國做生意的商人，以致練就印那一身做生意的好身手。雖然是一家小吃店，然大媽趁返鄉的旅途中，將具有賣相的藝品帶回臺灣，利用這些藝品將小店佈置得十分具有異國情調來吸引觀光客，也因此，返鄉對大媽而言，不僅是與家人團聚的

時光，也是為生意打點的好時機。

由於大媽做小吃生意，需要招呼客人，所以與她另約時間在埔里訪談。當我到印那大媽在埔里的家時，她仍放著上次在店裡聽到的音樂。大媽從廚房端出她拿手的擺夷料理後，便開始和從臺中來的林大媽，也就是林順麗的母親一起為我解開這音樂之謎。她們說：

這是我回家的時候，家裡的人請人來家裡唱歌嘛！唱的時候她們會錄起來，唱的都是唱家裡的人要告訴我的話，這不是流行歌曲嘍！是給我一個人聽的。比如你回去，你的家人也會請人給你唱歌，是專門唱給你聽的歌。家裡的人是要我不要忘了記他們，要我帶回去聽嘍！我每天都放來聽，聽這個歌就像回到家了嘛，家人在旁邊跟你說話一樣嘍！

當時在西雙版納家鄉是歌星的林大媽，因父親從事唱歌這行業，所以從小就在父親的嚴格訓練下唱歌。她表示如果家裡男丁要去當和尚、有人家建新房，或是廟裡有活動時等，她

和父親都會被邀請去唱歌。據她說法，唱歌時通常會有一人吹笛伴奏，由男女對唱，歌詞通常會跟出錢的人商量，若詞意表達不妥，出錢的人會生氣。換句話說，唱歌者的歌詞需要符合出錢的人要求。

大媽所帶回的藝品大多做為生意販售的商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從家鄉帶回來的音樂帶，既不是商品，也不會放給客人欣賞，而是當事人自己聽的家鄉音樂。幾位擺夷族大媽表示，她們返鄉除了會帶一些民族特色的服飾外，也會帶回家鄉流行的音樂，而其中最珍貴的是家人特地請人來家裡為返鄉的人所唱的歌。在聚落裡可見到有些擺夷媽媽們依著窗邊，或坐於屋簷下，一個人默默聽著家鄉的人給她的歌。在聽歌的同時就如印那大媽所講的，猶如回到家鄉聽到親人說話一樣。對她們而言，這是最貼近真實家鄉的方法之一。

家鄉的蝴蝶

不少大媽趁返鄉時，除了買一些藝品作紀念外，買上一套民族服飾是免不了的，雖然平



1

2

1 大媽於家屋前，展示妹妹前些年回緬甸家鄉時，受父親之託帶回她和妹妹的身分證明。2 大媽生前幾乎每日必聽的家鄉錄音帶。

日未必會穿，但在社區舉辦活動時，可是能派上用場。不少大媽在家鄉皆有織布的經驗，由於臺灣衣服布料取得容易，並不需要自己親自織布，以致於有織布經驗的大媽們，反而懷念起家鄉的織布時光，因而有不少大媽以毛線織品代替織布工藝。織毛線對一些大媽們而言，不僅是用來排遣時間，也可藉由織毛線來想念家人或作為對家鄉想像的連結。家住定遠新村為拉祜族的平蘭大媽，平日除了到農地裡栽種當歸作物外，其它的時間幾乎都花在織背包。原本以為大媽要將包包當作商品賣出去，沒想到大媽說：

以前家裡有種棉花，會織布嘎！以前都自己織嘎！現在沒得織囉！我又不會打牌，很多時間就織了嘎！我回去的時候，妹妹說沒什麼東西送我囉！就親手織這個背包給我當紀念，我都捨不得背嘎！想的時候就拿出來看看嘎！以前在家鄉也是這樣背了嘎！邊織邊想家嘛！

家住博望新村常強調自己是西雙版納擺夷族的刀大媽，不僅擁有一手好廚藝，編織本領

更是了得。有一天拜訪大媽時，她正為孫女編織毛衣，並展示家中客廳各式各樣的毛線織品。有鋪在沙發上的、蓋的、穿的等，其中的花樣與配色的功夫令人讚嘆！熱情的大媽從櫃子裡拿出一塊不同於客廳裡的毛線織物，底為白色的布，上面有各式花樣。這一塊布是大媽逃難時，在「拿不來」的狀況下，隨手將自己親手所織的床單，剪一塊下來，帶著當作紀念。她指著織在布上的美麗圖案說：「這是我以前十幾歲的時候織的，來臺灣嘛，不像在家鄉，織不得囉！我都想以前在家鄉織的圖案，要怎麼織才會漂亮好看。」大媽說還有一件特別的作品，旋即從房間拿出一有蝴蝶花樣的長型織物，她表示：

蝴蝶在我的家鄉是吉祥的、好的，我們很敬重，不可以像其它一樣墊在沙發上來坐。在我們家鄉老人就說，如果一個人運氣不好，得罪人，發生危險的時候，蝴蝶會飛來救人。我織這個是家鄉的故事不一樣的。

就在欣賞大媽的作品的同時，電視裡播放著家鄉寄給她當作紀念的錄影帶，大媽表示這

卷錄影帶的內容是村子慶祝重建佛寺落成時，家人錄下當天村長特別感謝她寄錢回去給他們重建的致詞情形。沒想到看著的同時，影片裡供佛像的兩旁，竟垂掛著和大媽手中一模一樣的長型蝴蝶織物，好奇一問，大媽笑著說：

就是我織的嘛！那是吉祥物，我身體不好了嘛！以前常常回去，現在心臟不好，去不得的嘎！我給他們織好了！就寄過去了嘎！放在那裡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嘛！那時候家裡的人跟我說，修建佛寺不夠錢，他們也是謝謝我，建佛寺是好事情，去年蓋好的，整個村子的人都來看來拜了嘎！

從大媽們返鄉的經歷中，可發現每個人對家鄉皆有一份濃濃的思鄉情愁，說起家鄉總是流露出不可言喻的懷念之情。對離家數十年的大媽們而言，返鄉曾是一個多麼遙不可及的夢想，如今千山萬水回到了家鄉，雖然大部分的人，無法回到當初的那個家，但不管如何，「家」還是回了。



1

2

1 大媽展示當年逃難情急之下，撕下一小塊自己親手所織的床單。

2 大媽表示，她常常邊織毛線背包，邊想念家鄉。

綜觀上述，在大媽們談論著「逃難」與「返鄉」的經驗時，對於家鄉過往的記憶，不斷地被喚醒與重現，在新舊經驗的交替之間，強化了對家鄉的想像與連結。她們從離鄉的驚恐害怕，經由勇敢的適應與養育兒女，中老年時得以有機會返鄉探親，一生的戲劇性歷程，多係於「雲南——緬甸——泰國——臺灣——緬甸——雲南」等空間轉換中建構完成（謝世忠 2002: 25）。

¹ 大媽自稱「老黑」即是昔稱的傣黑，也就是現今中國民族識別下的拉祜族。馬建雄（2004）表示拉祜族在地方漢語中被稱為「老黑」、「老赫」或是官方文獻的「傣黑」，在發音上並沒有明顯的差別，但當寫成「犬」部旁部首漢字時，「傣黑」就兼有地方歷史脈絡中貶抑的「野蠻」、「匪類」的意涵，這與中性的「老赫」或與原有與漢族手拉手，共同幸福之意涵的「拉祜族」，其間之詮釋差異頗大。他提到拉祜族於清朝官吏視為「傣匪」，到民族國家將其固定為「傣黑族」（一九五三年前）或「拉祜族」（一九五三年後）；在清朝時期隨著緬甸的殖民地化，傣黑被視為現代國家邊疆上的跨境民族。

² 這首是藍賀大媽用其家鄉族語唱出想念家鄉的歌，收錄在《我歌、我情、我鄉》（2010）之清境社區口述歷史紀錄影片中。
³ 指水牛內臟做的錦薩。

⁴ 這裡的什麼人都有，指的是各不同民族。

⁵ 「賣工」即是打工賺錢，「砍菜」是收成高麗菜，「揸菜」則是將種在梯田裡的高麗菜砍下之後裝到籬筐裡，請人揸上來再裝於貨車上。

⁶ 參考南投縣仁愛鄉公所網站。網路資源：

<http://www.renai.gov.tw/content/index.php?m=1&m1=8&m2=77.11010> 年四月三十日。

⁷ 臺灣的花卉拍賣市場由北而南有：臺北花市、彰化花卉批發市場、臺中花卉批發市場和臺南綜合農產品批發市場。

⁸ 參考清境旅遊資訊網。網址：<http://www.cingling.com.tw/cjgha/hotelist.asp?search=0­pe=0&searchs0=0>，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⁹ 根據我於二〇一〇年粗略統計，壽亭新村有七戶經營民宿，一戶於兩新村之間的公路旁開小餐館，其中一民宿，因無法負荷龐大的資金運轉，已賣給遠從臺北來的投資客，有三戶於草原之販賣區做小生意。定遠新村有五位村民經營民宿，一戶於家中開小吃店，有二戶於草原販賣區做生意。博望新村有十一戶之多經營民宿，有五戶開餐廳，除此之外，有四戶人家於自家門口賣水果、具民族風的衣飾、自釀的醃菜或自製香皂等小生意，再者有一戶於草原做生意。但除上述之外，義民人群投入觀光相關行列與日遽增，如：擔任民宿或餐廳之廚師、服務員或跑車趟等多元工作。



艷陽下的村落中，隨處可見辣椒放置在各種容器裡，紅通通的曬著。

第四章

生活的滋味：

日常文化實踐與認同

這娃也會「嘎」！

二〇一〇年夏天，剛開始在定遠新村跑田野時，遇見家住壽亭與我熟識的沈大媽，我學起村裡人講話的腔調，且在句末加上村人慣有的語助詞「嘎」與沈大媽交談，沒想到引起一旁的幾位大媽對我上下打量，臉色既嚴肅又好奇的問：「這娃哪裡來的嘎？咦！怎麼也會嘎？」。往後在村裡遇到較熟識的村民時，發現他們總愛調皮地在對我的問候語中，特別強調句末的「嘎」，且對我說：「你又來了嘎！」。「這娃也會嘎」的認可，讓我得以更深入義民社群。也因而體會到，語言是人類社會中重要的符號體系，它不僅作為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符碼，也是一個族群文化的表徵與認同的記號（Crystal 2001）。

清境義民人群之族群身份背景複雜多元，男性大多為雲南籍的士兵，其妻眷中有七個漢人，除了因續弦或離婚再娶鄰近泰雅族女子為妻的有四人外，其他多為中、泰、緬交界的非漢民族。三個義民新村共有泰語系的擺夷二十六人，果洛泰一人；傣緬語系的傈黑十七人，

阿佻八人，傈僳二人；苗瑤語系的傜家三人；南亞語系的仡佬二人，蒲蠻三人等（宋光宇：765-766；孟智慧2004: 46）。由於族群性複雜，語言也呈現多元化，聚落中最常用的莫過於雲南話，再來則是擺夷語。

由於第一代男性成員大多為集中在雲南省西南部地區之漢人，自然地用雲南話與鄰居對話。問起大媽們如何學會大多們的雲南話，那可讓大媽們笑個不停！因為她們都有「比手劃腳」的經驗。當初滇緬游擊軍雖有一些會操用擺夷話，甚至能聽講山地部落如阿佻或傈僳等族的語言（謝世忠2002: 20）；而這畢竟是少數且不甚流利，所以不少大媽們與大多剛結婚時，大多是用比手劃腳來溝通的。

早期她們下山去埔里市場買東西時，不知道該物品名稱，只好跟店家老闆用比的，也因語言上的隔閡，不少家戶家裡需要的用品都是由大多們下山採購。儘管如此，她們總會笑著表示聽不懂沒關係，可以比手劃腳，相處久了就聽得懂，自然也會講了。對大部分的大媽們而言，她們大多是在清境農場安頓下來後，才開始慢慢會講雲南話，經幾年歷練下來，每個大媽的雲南話都十分的溜！

安置初期，農場對外的交通不便，且當時義民人群皆有家眷，人群穩定性高較不易流動，語言保留上相對完整。然而，相較於過去封閉的時期，今日不僅交通上的便利促使流動性普遍，義民後裔在接受教育與大社會接觸的機會下，語言使用的種類已經超越日常慣用的「雲南話」。對第二代村民而言，他們皆能夠在國語和雲南話間流暢地轉換使用；但第三代的雲南話大多是用「聽」的，習慣以國語溝通。也就是說，國語已經是第三代在聚落裡於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語言，此情況令第二代的村民十分憂心。

記得二〇一〇年農曆年初六，在一個又濕又冷的天氣裡，與家住博望新村的洪富勝初次見面時，他對此有很深的感慨：

像我們住在周圍都是原住民的原住民鄉，我們的文化是不被重視的，我們的父親大部分都是來自雲南，我們講的話都是雲南話，我們的小朋友在學校安排學的母語是當地的原住民民話。我們的母親身份是雲南邊境的少數民族，像擺夷、拉祜、阿佤等多族群，但是，我們政府並沒有給予任何措施，我們可以說是少數中的少數，

所以說文化的傳承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

第一代的女性成員多半是中國西南跨境民族，她們則習慣以「擺夷話」交談。家住博望新村、雙頰總是紅通通、說起話來柔柔慢慢的蒲大媽，笑著為我解釋身為阿佤族的她，為什麼會擺夷話：

我們當年還在家鄉寨子時，家鄉種了玉米、穀子和棉花，收成以後，一年一次會去熱鬧的擺夷壩子玩啊、買東西啊、還去賣棉花或玉米呀，所以都會用上擺夷話，去了自然就會了嘛！就好比說我們去了埔里買東西，會學用國語講話一樣嘛！

由於各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條件不同，生產的農作物各有差異下，所發展出物品交流的景況。大媽稱壩子的地方，就是指平的地方，也就是盆地之意，此處乃為擺夷族居住的村落。山區的民族常藉由下來參與一年一度擺夷霸上的「趕擺」²，以達成交換、或買賣、或玩耍

等多重需求，並有機會學習擺夷話。聚落裡第一代非擺夷族的女性，多有如同蒲大媽的經驗，也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習慣以「擺夷話」作為溝通的語言是自然不過了。

偶而在村落間，可以聽到人數僅次於擺夷族的傈僳族婦女與其同鄉，講非雲南話的聲音。一問之下，才知她們所說的既不是雲南話，也不是擺夷話，是她們所稱的「老黑話」，但並不是自稱「老黑」者，所說的話都相同。住壽亭新村、人稱小奶奶的藍賀大媽和同村的梁大媽皆是傈僳族，但梁大媽就告訴我：「我們兩人的話不同，我們不一樣喔！」。另外，在定遠的平蘭大媽也自稱傈僳族，也聽不懂上述兩個人的母語。從她們的說明中，可以瞭解到既使族群族稱相同，但可能為不同支系；或分佈不同的區域；或遷徙等因素，彼此使用的語言也有差異³。所以說，即便傈僳族為第一代義民女性中，是次多人口數的族群，但傈僳話的使用也相當有限。至於其他沒有同族語對象可交談的大媽們，長時間下來，往往遺忘了母語該如何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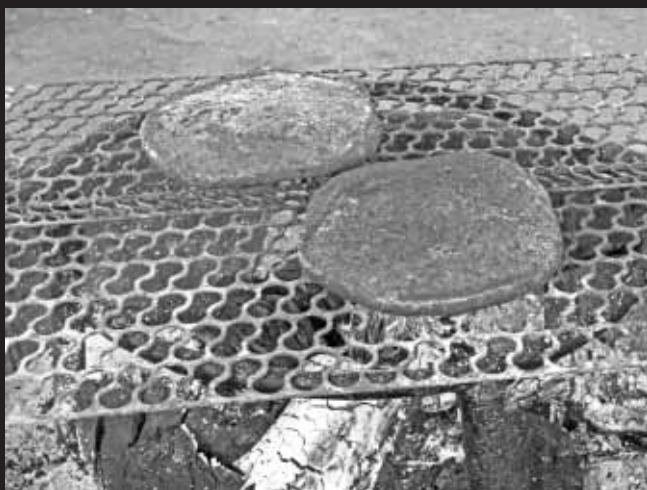
從上述可知，義民人群間最普遍的雲南話，對第二代而言，尚能掌握，但第三代大多是用「聽」的，這使得第二代村民對於「雲南話」的傳承十分憂心。第一代非漢妻眷中通用的

擺夷話，有些第二代聽得懂，但僅能說簡單的詞，少有可說得流利者；至於其他既非漢又非擺夷的族群，其族語因可交談的對象有限，長時間下來，往往呈現忘記母語如何說的窘狀，使得深具特色之母方族語，與其後代對於母親文化的陌生，成為謝世忠（2004[2003]p. 393）所說「單代認同」（one-generation identity）的現象。

語言在清境義民人群間的使用，雲南話大於擺夷話，而擺夷話又大於其他非漢且非擺夷族之語言。但不管是雲南話、擺夷話，甚至於國語，語言在義民人群中的使用，大多會隨著對象而轉換。也就是說，他們會視情況來決定所使用的語言，而在轉換的過程中，大多是基於「自己人」講「自己的話」的原則，這不僅是習慣使然，也顯現出語言為當地重要的人群認同指標。

烤個粑粑來吃吧！

猶記多年前，初次到清境壽亭新村報導人的家裡，一進屋，從廚房飄來濃濃夾雜著多種



1

2

1 田裡邊坡上的蘇子，是冬天做粿的來源。2 冬天圍著火盆烤粿，是村人歡樂又溫暖的季節。

香料的特殊味道⁴，那種說不出如何形容的香味，至今難以忘記，每回上山之旅，就彷彿重溫「味道」的記憶。這些特殊的味道，經由感官性的體驗銘刻在記憶深處，成為負載著深厚情感的清境義民人群認同標誌，就像南越的「酸湯」成為越籍配偶們一解鄉愁的最佳滋味（馬欣榆 2009:2）；義裔移民到美國後，常透過義式大鍋菜（one-pot dish）的分享來維持人際網絡的運作，並藉此凝聚義裔的族群認同（Goode et al. 1984）。這些來自義民之日常生活飲食的氣味與食物，究竟在不同季節和歷史脈絡中，承載了甚麼樣的社會文化意涵呢？

苦難的滋味

飯盛好放著了嘛，但心都碎了，

因為逃難煩惱而吃不下飯。

大家幫我想想看，有沒有法子，可以讓我不難過而舒服一點。

走在路上看見毛毛蟲，

不要打死牠，打死牠就像打死我的靈魂。

我雖然不在家，

但是吃飯的時候，也要供著我，我會出來給你們看看。

把毛蟲雙手捧起來放在箱子裡，打開箱子就看到爸爸媽媽一樣。5

這首歌是從小歷經戰亂的貝大媽，用她的家鄉語言唱出吃飯時對家鄉、家人的無盡想念。她與同村的蘭果大媽和壽亭新村的藍賀大媽是結拜的好姊妹，只要一有空，就會聚在蘭果大媽開的小店裡聊天、唱歌，貝大媽說唱一天也唱不完她想念家鄉的心情。

在清境義民有關逃難或是墾殖早期的記憶中，食物常是個醒目的要素。戰爭逃難非常時期的食物，是易於隨身攜帶的米和路上摘採的野菜，只能說是應急與保命之用，其中的苦澀記憶，自然談不上美味。定遠新村的玉雨大媽坐在屋簷下的舊沙發上，悠悠地敘訴著：

逃難的時候很可憐，每個人必須自己揀自己吃的米，停下來的時候就得自己煮米吃。早上和晚上煮各一次，早上煮好的可以包起來帶著，餓的時候拿出來吃。走了好幾天，大約走了一星期，男女生分開，軍隊有派一個（女性）跟著一起走照應我們。

在逃難的記憶中，吃不好、吃不飽是常有的事，所以她們常以可憐、很苦來表達。在父母親經歷滇緬邊區戰爭、逃離家園等故事訴說下，第二代普遍對長輩們昔日苦不堪言的生命經驗有著深刻印象。二〇一一年，博望新村土地公生日時，其中身材略有發福、平日與老婆種花的第二代阿富面對豐盛的廟會午宴時，他有感而發的緩緩道來：

我們松崗（博望）習慣在廟會時自己人下廚，擺個幾桌讓村子裡的人聚在一起吃，說難聽點，現在吃什麼都有啦！像我媽媽逃難那時候，他跟我們說身上就僅靠著米，要吃就得自己煮來吃。有次還在一隻巨蛇上升火煮起飯來都還不知道，等到

蛇動了，嚇了一大跳。吃是有飯啦，沒有可以配的，只好採摘野生辣椒配上身上帶的粗鹽和著吃了，就這麼算一餐，逃難嘛。

除此之外，苦難的滋味還包括了安置初期的墾殖生活。一九六一年底，義民人群進住農場後，農場於隔年開始分配土地和輔導義民墾殖。沒見過鋤頭是大部分義民妻眷的經驗，安置初期的墾殖生活對大部分義民來說，並不那麼的順利與適應。此外，早期農場對外交通還不發達，義民在經濟上的資源和食物的取得都相當不便。當時因只有夫妻倆口，而被安置在博望新村的曉邦大媽回憶墾殖初期的生活：

來博望時是十月，十二月我生小孩子嘛，當時還下雪，天氣很冷很冷啊，是阿嬤（同是安置在博望莆大媽的親媽媽）來幫我生。晚上六點鐘生嘛，第二天早上就起床升火做飯，沒想到用嘴吹個火，我整個人就頭昏跌倒，結果頭都撞破流血了。唉呀！我說姑娘呀！大媽剛開來山上的時候真是苦啊！生活也是有一餐沒一餐的，

五十年前，一天做工十五元，剛剛買一斗米，油啊、肉啊都沒有，你說苦不苦呀！
哪像現在，要吃什麼有什麼啊，方便多了嘎。

只要舂辣椒

喝這很好喝的酒，心裡很高興。

沒有魚，沒有肉，沒關係。

舂辣椒，加鹽巴，就很高興了！⁶

義民人群普遍嗜酸辣，辣椒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走在三個義民新村，隨處可見一盤盤大小不一的辣椒放置在竹編、金屬或是塑膠的容器裡。於自家屋簷下的椅凳上、別人家的屋頂上，甚至閒置一旁的耕耘機上，在夏天的豔陽下紅通通地曬著。

吃辣，對義民聚落的村人而言，是對過去的一份記憶、是日常裡的平凡味道；不僅如此，它還承載著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社會關係，是交換、是互惠，也是認同。

清境的第一代義民以雲南漢人最多，擺夷族次之，所以家鄉料理常以「擺夷菜」或「雲南菜」稱之。近年因應觀光的发展，一些村民由農轉商，將家鄉菜轉換為可賺錢的商品，這些食物中包括巴比喔（包料魚）、錦薩（剁碎的豬肉）、豌豆粉、米乾、大薄片、當歸雞湯等知名料理，其中包料魚和錦薩為最常招待客人大菜。但特別的是，主人往往在做好「大菜」之後，一定會在「沒什麼菜」之下，做了這道迷人的「小菜」——舂辣椒。

二〇一一年一月一九日（農曆十二月十六日），我在博望新村的尾牙午宴飽餐一頓後，旋即下定遠與壽亭兩新村看看他們是否也作尾牙祭，經兩處多位村人解釋下，才知壽亭宮並無作尾牙祭的習慣，僅由各家戶到壽亭宮拜拜。雖然沒有兩新村的尾牙宴可吃，但十分幸運，晚餐就在壽亭新村藍賀大媽「今天舂了辣椒，留下來吃個飯再走嘛！」的吆喝下有了著落。

大媽正開心的向我說著她今天舂的辣椒好吃不得了時，一位後期才來村子的蘇阿叔⁷，從門外走了進來，藍賀大媽見狀，便熱切的招呼，口中直嚷說沒什麼菜，但還是堅持邀請蘇

阿叔與我們一同晚餐。阿叔看看桌上的菜色後，即假裝生氣地說：「要什麼菜，我牙不好，這雞肉和魚我也吃不得，有春辣椒就好了，春辣椒就是最好了嘛！」大媽笑著手持湯匙要蘇阿叔馬上試試她得意的作品——豆豉春辣椒。

辣椒或鹽巴配飯不僅存在於第一代長輩們逃難或對家鄉的記憶，它在義民人群的日常飲食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在三個新村與村人共食的經驗中發現，即使平時家常的菜餚裡大都放了辣椒，理當夠辣了，但餐桌上仍常可見曬乾舂好的辣椒粉，或購自屏東或桃園龍潭的雲南擺夷豆腐乳，或自製的辣泡菜。倘若家裡來了客人時，主人似乎會忘記餐桌上已擺滿豐富的菜餚，而對客人說：「再來個春辣椒吧！」少了這一道「春辣椒」像是失禮，有了這一小碗的「春辣椒」彷彿才算真的豐盛。

舂辣椒可謂是一道獨特而迷人的食物。它的獨特，不在於食材的高級與否，而在於它的製作過程繁複；它的迷人，在於其口味依材料的不同，而變化萬千。舂辣椒的材料除了辣椒、蒜、蔥和鹽巴為基本食材外，配料則可以是小魚干、酸菜、蕃茄、馬鈴薯等各式各樣的食材。舂辣椒其製作過程繁複，通常會先將辣椒過熱油，有些甚至講究地剝掉硬皮，再取出一個木

製或金屬製的臼，將備妥的辣椒和其他配料依序放進臼中，慢慢地搗，搗至一定的爛度加上鹽巴，即是一道好滋味的食物。

我因長期受村人的照顧，所以常帶著各類食物作為伴手禮，小魚干因儲藏方便常是攜帶的禮物之一，卻意外地成了春辣椒的配料。又因自己對春辣椒的好奇與喜愛，常在不同報導人家裡嚐到私藏口味，甚至在熱情的村人打包之下，帶著春辣椒到處跑。原本以為這習以為常的春辣椒，應該不至於引起其他村人的注意，沒想到在分享的同時，竟引起村人對別人家口味的好奇，無意間，自己成了家戶私藏口味的傳播者。

「辣」不僅是上述中的一種記憶，一道招待客人的好滋味，也是一種人群的標誌。一般村人開的餐廳，菜色大多以家常菜為招牌來吸引顧客，但不同的是會去掉平日中嗜辣的元素，改用去籽後變得不辣的乾辣椒料理，讓食物看起來色香味俱全。但是，若是遇到自己村子裡的人上餐廳來，那可就不客氣的「辣」了。

我記得有一次與壽亭新村二代曼菊到一家博望村人所開的餐廳用餐，店家主人一看是「自己人」，便拿了一大匙的自製辣油，指導我們如何倒進桌上的一碗米線裡，強調這樣吃



1

2

3

1 大媽總愛用美味的「舂辣椒」來招待客人。2 舂辣椒是家戶日常的平凡味道。3 餐桌上的各項辣椒製品。



才會好吃又過癮。此時，曼菊表現出微微的猶豫，店家主人似乎絲微察覺曼菊的表情而說：

「不會吧！應該吃辣吧！」但在說話的當中，並沒有停止將辣油倒進碗裡。沒想到身體微恙不能吃辣的曼菊，仍將整碗辣呼呼的米線吃掉，在我下山的第二天，曼菊急忙來電請我幫她買藥上山。我好奇的問，為何沒有當場拒絕吃辣呢？她笑著表示：「不能拒絕啦，會被人家笑呢，人家會說怎麼雲南人不吃辣呢，再怎樣我也要吃呀！」這個事件清楚看見我群的認同凌駕身體不適之上；相對的，村人老闆在「自己人」吃辣的原則下，既使些微察覺似有異狀，仍不假思索地展現熱情，提供又香又辣的辣油，原因是「我們自己人」不可能不吃辣。

一向嗜辣的義民人群，並不是每個人都像壽亭新村的曼菊一樣，在維持「雲南人」應有的氣魄面子下，不曾改變吃辣的習慣。年紀大的長輩們中，已不似當年可以吃狠辣的勇猛，或是因身體狀況不能再吃刺激性強的食物改為較清淡的飲食大有人在，這種情況也漸漸地發生在第二代一些村民身上。然而重要的是，不管是否因年紀、身體或健康因素而改變了吃辣的習慣，「辣」仍然是義民人群中日常生活中我群認同的重要指標。

來自家鄉的氣味

由於清境義民人群多以雲南省漢人與雲南邊界之跨境非漢民族為主，所以飲食豐富度也相當多元。就以雲南來說，其地理條件複雜，族群眾多，百口百嗜，十地十味，各種飲食的習俗與嗜好，可說是繽紛各異（雲南省烹飪協會 2008: 9）。千百年來，各族群有的土生土長，有的遷徙流動，於山區、河谷或壩子裡，各自擁有獨特的民族文化。雲南西雙版納的各民族中流行這樣的一句諺語：「綠色的就是菜，會動的便是肉。」從香菜、芭蕉實、苦菜、青苔到臭菜，可採集的植物資源豐富；至於肉類的動物性蛋白質，取得雖不及植物食材便利，但因地理環境的條件發展出「靠水吃水」、「靠林吃蟲」和「捕獵田鼠」等多種飲食資源，也因此無所不吃之說一逕傳開（同上引：3-9）。

義民妻眷對食物的經驗，如同鄧啟耀（2009: 79）提過，吃對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而言，就在一個「野」字，野味的採集常是食物的來源。即使已經在臺灣住了近五十年的她們來說，對山林野菜的嗜好，依然是難以忘懷的滋味。問起家鄉可以吃的植物，不少大媽們總會一聲

長「耶」，像是發出抗議的聲音說：

我跟你說嘎，阿妹阿，在我們家鄉什麼植物、什麼樹都有嘎，要吃什麼，就去找，沒像這裡很少種啦。我們砍樹，放火燒一燒，就種穀子的，也沒種什麼菜呀！也沒放什麼肥料，什麼也長得粗粗大大的，做的菜都很有味道嘎。

家鄉口味令人難忘，尤其是對遠在他鄉的人而言。這也難怪，大媽們會有抗議的語調出現。大部分的大媽們，家鄉豐富的植物資源，以及族群有相當豐富的採集歷史與知識的文化脈絡傳承，讓她們感嘆在異鄉的植物種類沒有家鄉的多與長得好。所幸，家家戶戶門前，那一小片花圃或花盆裡種的各式獨特植物，不僅表現出，大媽們對遙遠家鄉食物的緬懷，以及包含談到家鄉植物豐富時的驕傲，更是大媽們日常「找菜」的好地方。

大媽們習慣使用香料理食物，門前花園大多種植日常用的辣柳、當歸、辣椒、臭菜、薄荷或酸木瓜等多種特殊植物。問起花園裡的香草何處來，他們總表示都是「自己人」⁸回

家鄉時帶回的種子，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漸漸地散播到臺灣各地滇緬邊區人群的村落。但有趣的是，不管園子裡的這些獨特植物是否喊得出名字，大媽們總是習慣以「緬甸菜」或「我們的菜」稱之。

聚落中有一「臭菜」，顧名思義就是以臭為名，其「臭」之味如同「瓦斯」味，所以又名「瓦斯菜」。家住壽亭新村沈大媽長年於臺中市照顧孫子，她總是趁回山上的機會帶回些家鄉野菜，一解住於都市苦於無菜可找的情況，並為家人添增菜色。有一天，她特別燉了一鍋臭菜野菜湯，沒想到臭菜之臭味被鄰居誤認是瓦斯漏氣，管理員一一巡視樓層下，終於在住八樓的沈大媽家位置找出這臭味的來源。此時，負責任的管理員面帶焦急的語氣告知：「沈太太，你家瓦斯漏氣了」，沈大媽只得故做鎮定地回應：「喔！好好，謝謝！我知道了！我馬上檢查！」雖說這事情發生已有一段時間了，但沈大媽對著我說時，仍激動地眼中含淚笑說「我真是不好意思嘅」。這些具有家鄉特色的野菜，常因它所散發出來的味道，不僅是人群記憶裡的好滋味，還因特殊的味道，經常惹出一些令人莞爾的趣事。

對普遍清境義民第二代成員來說，清境山頭的植物種類，雖沒母親家鄉來的豐富，卻也

傳承了母親認識野菜野果的本領。在山裡，有他們做玩具的材料，還有可以玩的泰山盪鞦韆。山林是他們兒時的遊樂場以及「零食」供應地，因此從小就鍛鍊一番好身手，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什麼好吃，太多能說的出來。博望新村的林大哥就說：

我們小時候是不吃早餐的，一下課就往森林裡跑，我們會找吃的，像什麼野枇杷、酸葡萄、肉桂皮、好多哩！我們還會帶著鹽巴到學校時，摘李子沾著吃呢，還有鹽酸樹成熟時拿果子吃，上面有天然鹽巴，但味道很酸。我們不僅吃，還帶鋸子鋸樹做木輪子，從山上的斜坡滾下來比賽，我們也會找藤子像泰山一樣在森林裡盪來盪去的。

壽亭的曼菊對小時候總知道什麼地方長什麼，又什麼是好吃的，深感不解的說：

很奇怪，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都知道哪裡長什麼，像現在賓館那裡以前就有長



1

2

3

1 特殊的香料植物常成為我在山下找尋義民人群的標誌。

2 夏天才有嫩芽可採摘的臭菜，因味道之故又名瓦斯菜，其美味令人回味無窮。3 村民家屋旁，種植各式各樣的「家鄉」香料，是大媽們「找菜」的地方。

野柿子，以前我們一放學就拿著便當盒鑽進像隧道一樣的叢林裡，一邊摘紅袍子，一邊吃。

野味的採集與狩獵是不少大媽們在故鄉時的生活方式，加上原本在家鄉互沒有機會接觸的族群，因安置政策變成鄰居，透過相互學習和共食的機會，原來屬於各民族的飲食口味，彼此間交揉並傳遞開來，成為今日在清境義民聚落的飲食樣貌。第二代在日常生活中，無意間傳承了母親對於野味採集的知識，與同伴們一起在清境山林間探索與實踐，並進而創造出屬於他們對這片土地的記憶。

冬天到了

海拔平均在一千七百公尺以上的清境農場地區，整年氣溫比平地較低外，到了冬天更是明顯寒冷，尤其連續幾天的寒流過境時，鄰近的山頭總會在下雪後，像裹上一層白白的糖霜

矗立在遠方。這時，田裡的農耕工作也隨著冬季季節的到來，由忙得不可開交的夏季生活，漸漸進入休耕的狀態。對大部分從事農耕的村人而言，這是他們一年中最放鬆心情的季節。

隨著天氣溫度的下降，大家開始搬出電暖氣或將火盆架上，準備過個暖呼呼的冬天，或計畫出遊。因為從十二月中旬後，不管是種菜或種花的村人們，農地裡除了簡單的工作外，大多有輕鬆的時間。因此不管是定遠和壽亭新村所組的大同園藝產銷班，或是博望新村的松崗花班或其他花班，社區發展協會或其他團體，常利用這時節結群出遊。此外，冬天對清境義民人群來說，更是準備「做」食物和期待「吃」粍粍的好季節。

冬天裡，若逢寒流又天晴的日子，走在聚落裡，會發現家戶的屋簷下，用鉤子或衣架掛著一排排各式的臘肉臘腸；也可看到用竹編的圓形淺盤上，晾著黑黑的、一個一個用手捏成手掌般大的豆豉，不僅隨風飄來陣陣特殊的氣味，也形成一幅冬天特有的景象。聚落裡的大媽們大多保留原鄉醃製食物的習慣，種類雖不及於家鄉「做」的多，但食材來源仍依季節的變化，於製作的時間上也有所不同，像泡菜因在冬、夏天都有高麗菜或大白菜隨時可醃製，酸筍幾乎都得在夏天製作。一旦入冬後，更是「做」食物的重要季節。早些年，一般村民冬

天製作的食物有甜酒囊、豆腐乳、豆豉、臘肉或臘腸等許多種類，其中以臘肉和臘腸算是最大宗。

二〇一〇年末，有一天算算日子，發現不到十天就將跨年，離農曆年也越近了。連續幾天暖陽高照的好天氣，一掃之前濕冷天氣的陰霾。壽亭新村的幾位大媽忙著整理和巡視屋前懸掛的臘肉，並竊竊私語的討論著。一問之下，才知原來大家都覺得要趕在好天氣時，再多做一些，尤其臘腸也得請阿明老闆上來灌了。由於老闆有灌香腸的機器，所以天氣一冷，村人會先做臘肉；經大家商量後，再與他約好時間一起灌香腸。

阿明夫婦是埔里第三市場豬肉商販。據阿明老闆表示，他自一九六八年於軍中退伍後，就上來賣豬肉，從騎摩托車到開貨車，至今已在山上做了四十多年的生意。這當中，家人還曾上山租田種高麗菜，甚至還標過壽亭新村的福利社賣東西。另外，早期村民有政府配給發的糧票，由於交通不便，他都會幫忙村民去農會領米，再帶上來給他們。他感嘆以前雖然交通不方便，但生意比較好做。然而，即便生意不如從前，他與村民仍保有著深厚情感。老闆年紀漸大，一天馬不停蹄的工作下來，常讓他們夫妻吃不消，冬天山上的低氣溫，也常讓他

們卻步。上山的次數漸漸少了，村民下山到他店裡灌香腸的次數，倒是增多了。

冬日的暖陽與冷冽的空氣並存，只是這天的天氣不再像之前寒流來時的潮濕，天空也顯得格外湛藍與清明。在大家討論後的第三天，早晨不到九點鐘，在阿明豬肉商販夫婦的吆喝下，壽亭新村的大媽們紛紛擱下手邊的工作，手持臉盆，從屋裡或其他角落走向停在第二排沈大媽家屋前的小貨車，大家圍著小貨車東挑西撿的翻著豬肉，此起彼落的嘈雜聲，劃破了壽亭新村平日的安靜。美虹大媽用慣有尖細的聲音表示：

像今天的天氣最好了。做臘肉最怕遇到壞天氣，要是下雨，那可慘了，有時都會壞掉、酸掉呢！喔——也不是說我們家鄉就比這裡冷，在家鄉做都是做很大塊呢，但是做了也不會壞掉呀！

家住美虹大媽家隔壁的藍賀大媽也說：

我們家鄉冬天冷，比較好做，像現在這裡天氣都不穩定，變來變去，或是下雨都會做不好，在家鄉哪有人做那麼小塊，但是這裡只能做小小的，太大了怕做不好，

會壞掉呢！

一旁聽了頗有同感的雲南漢人——管大媽，忍不住用雙手比劃且口吻略帶不平的表示：「是啊！我們一做就是一條腿呢，哪有像現在做的臘肉，一小塊一小塊的。」聽著身旁眾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嚷嚷，忙得連一刻也閒不下來的阿明先生笑著說：「我們元旦後，還要去定遠做，那裡有人要做一頭豬哩！」這席話雖然是真的，但卻惹來現場大媽們笑個不停。

這天，壽亭新村的大媽們大多以做臘腸為主，而且做的量都是十斤、二十斤左右，其中做的臘腸有豆腐腸跟一般的臘腸兩種。此時此刻，媽媽們親手做孩子們懷念的食物，成為一種儀式，透過「做給孩子們吃」的過程中，個人的情感藉由「做」與「吃」呈現，不僅個人得與過去的記憶連結，並且再現過去的家庭生活記憶。

我看美虹大媽做了近二十斤，原以為家裡開民宿要用的，沒想到大媽低聲的表示：「是

給孩子們過年回來時吃的，而做生意要用的我們會另外叫。」一旁的管大媽邊將香料倒進盆子與碎豬肉攪和，邊笑著說：「孩子打電話回來說，想吃家裡的菜，唉呀！我這一做就是要做一年份給他們呢！喔～他們的冰箱可大呢！」這誇張的「一年份」，惹得在場的人忍不住笑出來，就連阿明老闆都忍不住地笑說：「是啊！專門冰媽媽的菜。」有好長一段時間住高雄美濃的第二代曼菊，看著媽媽做的臘肉有感而發說：

雖然自己會做菜，但就是愛吃我媽做的菜，以前在美濃都會想吃媽媽做的臘肉，每年都會要媽媽寄過來。我媽放的香料她都是先炒過，所以就特別香，也不知道為什麼吃不慣別人的，可能別家的常常太鹹吧！

平日與先生忙於農作，週末擺攤賣小吃的慧慧同意地說：「像大媽放那麼多香料，我們做生意不僅成本划不來，像我們這種重口味的，遊客也不一定會喜歡。」而專門做來賣的阿淑大姊，專心的與阿明老闆邊討論，邊秤鹽巴與味精的重量。就在阿明老闆認為，這是商業

機密，笑著說不便告訴我的同時，管大媽拌好的料，已在廚房裡炒好裝在盤子裡，端出來要大家品嚐並提供意見。原來大媽們要灌之前，為了保險起見，歷年來都習慣將拌好的料先炒出來給在場的左鄰右舍品嚐，再依大多數人的意見修正口味。大媽們對私家口味開放，與阿明老闆「商業機密」的態度，迥然不同；在「自己吃」和「做生意」的口味秘方上，也有所不同。「做生意」的，會因成本及顧客口味接受度，而作調整。

這些醃製食物包括臘肉、臘腸以及豆腐乳、豆豉等，只要陽光夠充足，基本上全年都可以做，但在清境地區春、夏季節時，不僅因雨水多造成濕氣較重，不適合製作之外，尤其田裡農作物施肥後，蒼蠅橫行的狀況更是帶來莫大的困擾。相較於此，冬天時不僅雨水少、天候較乾燥，田裡又進入休耕期，村民少了田裡繁重的工作與擾人的蒼蠅作祟，使得這類食物的製作，大多集中在冬天。

根據我這些年來的觀察，冬日醃製食物中，臘肉臘腸的製作比例仍是較高，其餘如豆腐乳、豆豉這類的製品已較少人作。主要原因大約可歸納出幾點：一為交通便利食物取得方便；其次，村人因經濟改善對醃製食品的依賴度不似以往高；再則，由於原本桃園與屏東製作這

類食物較不受上述天候條件影響，加上清境地區觀光的商機，讓不少腦筋動得快的人，試圖將這類食物透過三個新村之親友幫忙販售，其中豆腐乳與豆豉由於售價低接受度高。

基於上述的情況，村民經過一番衡量後，村民普遍覺得臘腸臘肉用買的價錢不划算，以致大部分人保留自己做臘腸臘肉，只有極少部分的大媽堅持自己做豆腐乳與豆豉製品。年輕一代以「蒼蠅多」、「懶得做」或「學不贏」為理由，認為豆腐乳與豆豉製品用買的划算，加上年邁的大媽們「做不贏」的情況下，村人集體訂購此類食品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在雲南以及西南邊境家鄉，「粑粑」通常是過節或居家的食物之一。不過在清境地區的義民聚落裡，逢年過節或有關宗教的節慶上，並不會特別吃粑粑。對他們來說，粑粑是屬於冬天的食物，要吃粑粑，可得等到冬天。相對於此，在義民後代開設的餐廳裡，菜單上都可以看到粑粑，一年四季裡都可以吃得到。餐廳裡所販售的，一般以馬鈴薯做成小丸子形狀的洋芋粑粑，或是圓形餅狀的糯米粑粑為主，前者蒸熟即可食用，大多為鹹的口味；後者為蒸過後，放涼再烤或煎才吃，口味隨個人喜愛可辣可甜。

根據村人普遍的說法，早期有些媽媽會做粑粑，但因嫌麻煩，目前僅剩下博望的武大媽



1

1 春末夏初李子成熟時，村民相邀「扮李子」，鹽巴、辣椒相拌，其滋味除了酸之外，就是辣！2 超有味道的豆豉，已經越來越少人做了。

2



1

2

3

1 大媽們相互幫忙灌臘腸曬臘肉。2 一到冬天，埔里第三市場豬肉攤的阿明老闆總會應村民要求，載著豬肉和灌香腸的器具上山。3 灌臘腸之前，大媽們會炒好自家秘方餡料供大家品嚐，並依眾人的評論加以修正口味。

還保持做粍粍的習慣。武家之所以還有做粍粍，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田地裡種著「蘇子」。

「蘇子」為三個義民新村村民對芝麻的一種稱呼。武家農地裡種的蘇子與我們平日常見的芝麻於外型與顏色上有些差別，不似市面上的芝麻為黑白兩種，其顏色為咖啡色中帶綠，體積較小，形狀似小珠子一樣為圓形。

一天，我在武家的百合花田裡，聽著武大媽用她那細弱的聲音，述說田裡蕎麥和蘇子的由來：

蕎麥是朋友去四川時，我特地請他幫忙找，帶回來給我的。拿著小小的種子，我就往地裡撒嘛，剛開始長不多，慢慢的收了好多次，種子就多了。蘇子嘛，是住在泰國的朋友寄來給我的，在家鄉嘛，田裡都種著。每天我都會在田裡工作，想家時我就看看蘇子，看看蕎麥嘛！

盛夏裡，蘇子一株株綠油油地錯落在一層層梯田的邊坡上，圍繞著以百合花為主的地裡，

經大媽的兒子的說明，令我不僅意外發現武家所種的蘇子，更分辨出眼前蕎麥和蘇子的不同。蕎麥就讓它在地裡長著，既使收了也沒食用；但蘇子不一樣，是冬天做粍粍重要的材料。冬天到了，武家地裡的蘇子成熟了，大媽和家人忙著採蘇子、磨蘇子。當然，也趕著做蘇子粍粍，做出的成品總在村人紛紛預購下，每一批都銷得精光。

對武家大媽而言，粍粍廣受村民的喜愛，不僅成為家裡經濟收入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承載著大媽濃濃的鄉愁。雖然，粍粍在義民人群日常生活裡，既不家常也不重要；但我發現，粍粍在清境義民人群中，展現出不同層次的意義。

大媽年輕時，匆忙地隨著軍隊來到臺灣，或許什麼也來不及帶，但對家鄉的思念卻未曾間斷。由於想念家鄉的緣故，早些年前，因暫住家中的友人要回家鄉四川，託請他幫忙找「家鄉的種子」帶回來；另外，遠住泰國的朋友，也為她寄上家鄉的種子。縱使蘇子和蕎麥的種子不全然來自家鄉，但將朋友給的種子撒在自家地裡的邊坡上，讓至今未曾回鄉過的她，看著這些植物就如同看見家鄉一樣，其中蘊藏著無限的思念與想像。

寒冷的冬天裡，只要一談到粍粍，村人的眼睛立刻閃亮起來，並會開始訴說，大夥們如

何圍著火塘烤粿的歡樂。不論灑上糖粉或是抹上辣椒，粿的滋味或口感並不是村人最在意的，而是透過冬天，眾人一起放鬆地相聚和吃粿的過程，在在反映出，村人在季節的變化上對生活的一種態度與記憶。

一 請神，二請人

清境義民人群中除了三戶伊斯蘭教徒和少數的基督徒外¹⁰，大多於家中設置「天地國親師」的紅色神龕。居民表示安置初期，雖有基督宗教的神職人員傳福音和發放救濟物資，但男性長輩禁止小孩參加教會活動，並積極興建山神廟與之對抗，只有少數的村民轉宗。聚落中至今尚未有任何基督宗教的教會建立，與早期農場不讓出土地興建教堂，也是關鍵之一（孟智慧：2004）。這種情形不僅和周遭原住民部落皆有教堂的情況非常不同，與分發在屏東農場的義民聚落有兩個基督教宗禮拜堂之情形也不同。

位於博望新村的慶安宮及壽亭新村的壽亭宮，每年都會各自舉行大小程度不一的祭儀活

動，這兩座廟宇不僅是居民口中所稱的「山神廟」，也是義民聚落中重要的村廟¹¹。根據慶安宮牆上的碑文和壽亭宮牆上所懸掛的落成誌的記載，兩者分別於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八六年落成。不過，早在上述的落成日之前，兩個新村的村民就分別以泥土、竹子或鐵皮搭設簡單的建築，放入紅布替代神像祭拜，稱之為「山神廟」，其原因是：

在雲南家鄉就像在清境一樣是山區，以前老人家會說山林裡有山神，在老家也是靠山吃山，我們在這邊種花種菜什麼的也是一樣靠山吃飯，其實就像土地公一樣保護土地和村莊裡的人，那山神也是像土地公一樣保護住在山裡的人和我們種的東西。

對義民人群而言，所謂的「山神」是依據長輩們在家鄉信仰的觀念而來，是對山林鬼神的一種崇敬心理。所以說，不管山神或土地公，對村人而言，都是代表守護村莊與村人的神。以下分別敘述壽亭宮與慶安宮，及相關信仰和慶典活動在兩個義民新村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

能。

壽亭宮：暖壽之夜

有關清境義民人群的研究中，少有人提到壽亭宮，我認為有原因有二。一是壽亭宮位於全村最低、一般人不會經過的地方，且被村公所擋住，不易發現。二則為，壽亭宮一年僅一次土地公生日大拜拜，其餘一般民俗節日，壽亭與定遠村民皆為家戶各自前往祭拜，其管理委員會並不特別規劃舉行其他祭拜儀式，因此不易聽到村民談及有關壽亭宮廟會活動的話題。

壽亭宮位於壽亭新村之村公所的左後方，主要供奉福德正神，目前由壽亭與定遠兩新村共組一管理委員會經營。對於山神廟的稱呼，義民聚落村民的解釋幾乎一樣，皆是老一輩對山林崇敬的宗教觀。只是壽亭和定遠兩村民大多無法解釋壽亭宮裡，為何不像博望的慶安宮一樣，有一尊黑面的山神偶像，而是一尊福德正神——土地公。

據村民的描述，當初義民人群到此地墾殖時，長輩們就於壽亭新村的東北方，也就是現

今清境國小下方的小路旁，搭起簡陋的建築為山神廟，但當初其中並無神像，僅以一塊紅布為祭祀的對象。後來陸續發生了一些事件，請了地理師來看之後，才遷至目前的位置，並命名為「壽亭宮」。

村中流傳著有關山神的「靈驗」事蹟，如昔日有些調皮的小朋友路過山神廟時，偷吃山神的祭品或做壞事等，引來山神的懲罰。一位村中第二代村人告訴我他親眼看過這樣的案例：

這真的不騙人，全村的人都知道，而且我還是親眼看見的。那時候還是小學嘛，有一天放學經過山神廟時，X家老二一時之間不知怎麼了？拿石頭丟，又是拿糖吃，又是撒泡尿，調皮過頭了，這不得了！回到家裡整個人瘋了，趕快用米酒驅邪嘛，沒有用，家裡的人嚇壞了，就送往醫院去，送往醫院的路上車子竟然翻車，山神真的生氣了，這不能不信喔，真的是靈驗嘍，結果他整整一個月（或一學期）都沒來上課，都在住院。

一旁的村人都贊同山神的靈驗，當下議論紛紛：「還不只這件事啦！之後×××的二姐被煞到，他們就請地理師來看，這一看地理師說一定要遷，之後才遷下來的嘛！」

從一開始簡陋鐵皮所搭建的山神廟，因村中發生一些不平靜的事情，特地請山下的地理師指點，遷至目前的位置，村人對於山神懲罰小朋友一事的結論是：「山廟好靈啊！」而「壽亭」村民「靈驗說」的共同記憶，藉由上述的故事流傳下來，成為村民日後邀請村外人參與一年一度土地公生日廟會的重要理由之一。

在多次不同場合談起壽亭宮時，村人大多慎重地表示，這是上一代老人家來了就有的，也是留給他們下一代的重要傳承，因此有義務跟責任要好好維護下去。也正因為義務與責任的傳承，面對一年一度盛大的土地公生日，委員們都會特別提到「要認真」的做。但當我二〇一〇年參與土地公生日籌備會議時，卻發現過程中屢屢發生衝突，幾乎無法按照正常的程序來開會，通常在幾次激烈的衝突後，總是由女性長輩出面安撫、協調與擇日開會下，才有辦法順利地進行廟會相關事宜規劃與執行。

土地公生日籌備會後，幾位第二代村民表示，壽亭與定遠兩新村的大多僅剩三位且年



1

2

1 壽亭村民合力為土地公生日前夕的「暖壽」活動下廚做準備。

2 壽亭宮土地公生日當天的服務台常是村民關注的地方。

事已高，村裡的大媽是他們的寶。或許基於這樣的想法，我發現第二代的村民十分會跟第一代的大媽們撒嬌，所以在在大媽們出面調解勸說後，通常會願意配合。面對這樣的現象，幾位大媽們感慨地跟我說：「以前大爹他們在的時候都不會這樣，我們有什麼事喊一聲就出來幫忙了嘛！現在老人家一個一個走了，年輕人不像以前了嘛！」大媽們的感嘆，表示著昔日村落裡的事務是有人做主的。

早期安置清境義民皆為農場管轄，關於村中的事仍聽命於農場的指示，大部分村民鮮少有機會及場合聚集討論公共事務，通常由當時村長代表村民參加農場的定期集會，有關場方要傳達的事項皆由村長向村民轉達。換句話說，大家皆以村長為「頭」，習慣在有「頭」的帶領下展現出合作的精神。

當村裡的「頭」由第二代接棒時，在誰都想當老大、誰也不服的心態下，壽亭與定遠兩新村呈現無明確的「頭」的狀態。由於村中一年僅有一次的廟會活動，原本內心存有對村中事務的不滿，日積月累形成對私人的怨懟，然這不滿的情緒，往往得等到每一年廟會活動籌備過程才有機會抒解。也因此，無形間成爲一種習慣，而這種習慣性的內部衝突，甚至造成

日後參與社區活動時，留給外人的印象與風評。

克服內部衝突後，一切籌備事務如掛燈籠、發帖子、壽亭宮的整理，以及土地公生日當天誰負責什麼事的規劃，在生日前一天大抵完成並就緒。特別的是，在這天的下午，村民有空閒者，不分男女老少聚集在土地公前的前庭開始洗菜、切菜，並將當天爐主¹²祭拜土地公的祭品，一併作為準備「做菜」的食材，來舉辦晚上之「暖壽」儀式。

目前暖壽的工作幾乎交由第二代在處理，但村裡的這些大媽們仍習慣到現場來看看是否可以幫忙的，像是管大媽擔心菜量不足，特地帶著自己種的蘿蔔過來，原本要返鄉回緬甸的美虹大媽也不放心，特地將出國的日期改在土地公生日後再走等等，都是想讓廟會活動能順利進行。熱心的美虹大媽指著壽亭宮前庭棚子上所垂吊的燈籠滿意地對我說：

你看這燈籠漂亮吧？唉呀！我本來上星期就要回緬甸了，我心裡想那土地公生日怎麼辦？我不放心，擔心年輕人忙不來嘍，我想了想，還是過了土地公生日再去吧！我要楊明光換上這些燈籠，再去買幾個盆栽來，整個打理一下，現在順順利利

的、裡裡外外都做得好好的，這樣我的心裡比較好，等明天中午吃過飯我就去臺北了，後天的飛機嘛。

連續兩年被推為暖壽主廚的思麗阿嫂，忙著切菜之餘對在場的大媽們撒嬌說：「以前都是你們在做，現在你們看就好了，換我們來忙了嘎。」在一旁的幾位大媽你一句我一句地笑著說：「是了嘎！我們老囉，你們什麼都要學都要做了嘎！自己村子的事要自己來做嘎。」由定遠新村嫁來壽亭新村的自己人郁芳，放下自己餐廳生意不做前來幫忙，她解釋說：「我們從以前就都這樣看著老一輩的人做什麼，我們就照著他們意思去做了嘎！」雖然是女性掌廚，但在一旁的男性會邊聊天邊等候差遣，看著大湯鍋的火候，或是幫忙抬大鍋、搬桌椅之類較粗重的工作。整個過程中，村人說說笑笑嬉鬧著，彷彿之前不愉快的衝突不曾存在。大媽們對村中事務積極熱誠的態度，是「軟化」內部衝突的重要推手。

依我連續兩年參加此儀式的觀察，壽亭宮之「暖壽」儀式，大抵以爐主當天中午過後，將前一年請回家裡的土地公迎回壽亭宮為主軸，其中除爐主與副爐主會準備水果和三牲祭拜

外，並沒有一定要村民前來祭拜的儀式。反而特別強調村人要「在一起」，尤其是聚在一起下廚做「我們的菜」。

該晚以辛、酸與辣為主來調料理食物，通常會有拌麵、炒米粉、涼拌豌豆粉和一大鍋蘿蔔湯或雞湯。在眾人一起共食下，如此溫馨又愉悅的「暖壽」，轉化了之前會議上的不愉快，並將上一代對村中事務熱誠的態度，藉由土地公生日的「暖壽」過程，傳承給下一代，且為隔日的活動鋪陳內部凝聚力量，以便在土地公生日當天能以最佳狀態展現。

經過前一晚的暖壽活動，大家有默契地培養出「好好表現」的態度迎接土地公生日廟會，大部分委員精神抖擻地穿上壽亭宮委員會專屬的背心，忙碌地穿梭在廣場搭好的棚子下。大家就分配工作的事項，其中有些人負責接待誦經團，有些人於臨時設立的服務臺負責收禮金與發財金，有的忙於接待外地來的親友或附近民宿業者，部分村民於下壽亭新村的路口負責交通車輛的管制等，戰戰兢兢在自己的崗位上執行任務。平日寧靜的村子，在擴音器傳出誦經團的經聲中，揭開一年一度壽亭宮盛會的序幕。

壽亭宮自一九八六年重建後，整年的祭祀活動以農曆二月二日的土地公生日為最主要的

廟會活動，其熱鬧程度與慶安宮農曆七月普渡的盛況不相上下，村人並以「比過年還熱鬧」來形容。壽亭宮一年一度的盛會，總是讓一些長年住在其他縣市的村人趕回來，像住在臺中幫兒女照顧孫子的沈大媽，原本已經打電話回來給美虹大媽說今年不能回來了，沒想到暖壽結束後她卻在兒子和孫子的陪同下，風塵僕僕地趕回村子。左鄰右舍見狀皆高興得出來噓寒問暖，兒子笑著對大家說：「不帶她回來不行喔，一直唸喔！」從外地趕回來的不僅是壽亭與定遠兩村的成員，就連在北部或遠在高雄農場的「自己人」，也會在村人的邀請下特地上山來。據老一輩村民的說法「大家都年紀大囉，生病不能動的，越來越少人來了嘛！」除此之外，鄰近的民宿業者是必邀請的對象，第二、三代也會邀自己求學或工作認識的朋友上山來共襄盛舉，使得廟會活動熱鬧萬分。

由於壽亭宮前庭能容納的人數有限，活動分為兩個區域進行，一為爐主、副爐主與部分虔誠的村人，共同參與誦經團在壽亭宮前庭的祭拜儀式；另外，整個廟會的迎賓簽名、包紅包掛禮、辦桌與舞台車的活動則在村中的大廣場進行。對村民來說，席開二十三桌的廟會午宴是壽亭宮重頭戲，桌數的多寡代表著該年辦得成功與否。然而，午宴的內容與前一晚暖壽

的菜色風味截然不同，暖壽時為「自己人」吃的菜，講究的是「自己的口味」，以酸辣為原則；午宴則是「宴客」的菜，強調的是菜色要豐富、體面。

當眾人開始享用美食之際，受邀與會的政治人物或鄉公所代表會被請上舞台致詞，緊接著整個活動就在豐富的食物、舞台車上炫麗的節目表演以及請來謝神的「辣妹」敬酒中進行，並且在村人慣例捉弄臺上唱歌者喝下「加料飲料」時，整個活動達到最高潮。

這「加料飲料」的戲碼，是村中年輕一代發明的，只要喝下摻有桌上各食物湯汁的酒，即可得到臨時募集在盤子裡的錢的遊戲。這遊戲常引起村人瘋狂喜愛，並讓遠從外地前來參加的友人，直呼「太酷了！」，尤其在眾人齊呼「喝！喝！喝！」的叫聲中，讓整個宴會達到沸騰的境界。吃完午宴後，兩村不少第二代成員會留下來繼續開心地唱歌、喝酒與嬉鬧，該年的土地公生日活動，一直到天黑之際，才真正地結束。

在壽亭宮土地公生日慶典活動中，最具人氣之處，就是給人包紅包掛禮的服務臺了。村民非常關心「外人」捧不捧場土地公盛會，盯著前來掛禮者的同時，總會聊起一些相關話題：「是哪家民宿來了？」、「掛了多少禮？」、「哪家民宿今年怎還沒來？」，或是「今年增

加了多少家民宿業者？」等。幾位委員十分滿意的向我透露，這一兩年來民宿業者不少人來掛禮，這不僅讓他們的經費可以充裕些，也代表壽亭宮真的「靈驗」，以及這些外來者越來越認同他們了。

當初安置清境之義民皆已結婚，加上受場部所管理，除了菜商外與外部接觸的機會極少；如今面對外來新移民之生存競爭，以及與這些被村人稱作「體面的人」¹³為鄰之雙重壓力，無形間產生一股莫名的焦慮且自卑的氛圍。不過，近年來，村民認為這些鄰近的民宿業者會來壽亭宮拜拜是有心的，便開始積極邀請他們共襄盛舉。為了希望帶給對方好印象，通常會派人送上印製精美的邀請卡當面邀請¹⁴，一改以往對鄰近「體面人」的消極的態度。

昔日壽亭宮仍為第一代長輩管理時，保有雞骨卦的習俗，但因傳承斷裂以及部分村人認為「卦不得」的情形下¹⁵，近年來幾乎已不再進行，但對於正午時所進行的擲筊儀式卻十分重視。村人常為了「誰」有資格參加擲筊而發生激烈的討論，一派只贊同兩村的「自己人」參與；另一派認為只要想參加的人皆可，不限制他是從哪裡來。二〇一一年新產生的爐主與副爐主的「身份」，再度引起村人熱烈的討論。

擲筊所產生的新爐主與副爐主身份特殊，皆非義民後裔，兩者財力又相當懸殊，成為盛會後爭議的焦點。¹⁶最後委員開會作出決議：「不管貧窮或富有或高低身份，只要住在霧社以上範圍皆可參與擲筊爐主的儀式活動。」村民一方面希望有越多「外人」來參與，但一方面又擔心被「外人」搶走風采，所以每年對於爐主的產生總會有新的討論和規範。

廟會活動不僅是凝聚「自己人」內部力量的重要場域，也是內部社群連結外部社會，擴大社群網絡的機會。村民積極希望鄰近民宿業者的參與，不僅能讓壽亭宮的捐款能豐富些，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參與代表著對村人的肯定與對地方的認同。但另一方面，村人又深怕擲筊產生的外人爐主搶走他們的風采，以致擲筊活動年年有新規則出現。我認為部分村人陷於「掛禮」與「擲筊爐主」之間的矛盾，最大的癥結應是「自己的廟」怎可讓「外人」來決定運作之我群認同的問題。就以這次擲筊出來的爐主與副爐主而言，一位是遠從臺北來此經營民宿的業者，另一位為定遠新村的越南媳婦，在委員會之會議後，決定視為「自己人」的情況下，才得以順利成為壽亭宮新年度之爐主與副爐主。

慶安宮：大宴賓客的日子

慶安宮位於博望村的最末端。當壽亭新村居民於一九六九年積極地向農場場部提出申請蓋教堂未果的同時，博望新村居民自籌款項，向場部報請建廟計畫，獲得場部的許可¹⁷，於是在隔年將原本位於目前小公園下方處的簡陋山神廟，移至現今的位置，命名為慶安宮，村民習以「廟房」稱之，供奉五尊神像，為博望新居民主要的信仰中心。近年來，村民為發展觀光事業而積極開拓觀光資源之際，將慶安宮列入社區導覽之景點，並製作寫有「心誠則靈」的木牌，掛在慶安宮建築上，將一個看似十分平凡的村廟列為觀光景點。

據村中幾位村民表示，他們的記憶中，慶安宮前身僅是竹籬笆和泥土搭建的山神廟，與壽亭宮的前身一樣，都是紅布代替山神偶像，在往後的日子裡，才一步步增加了山神偶像、城隍王爺像等達五尊之多。村廟的主神由山神變成城隍王爺的過程，是段令村民不堪回首的生活，也是村民的共同記憶。

安置初期農墾生活相當困苦，甚至被菜商倒債、適應不良、家庭失和等情事頻頻傳出，

使得村民決定請山下的地理師上來看看。對於長輩辛酸的過往，一位第二代成員不忍心地說：

較早的記憶應該是紅布嘛，我們是都稱山神廟，那時候是泥土竹籬笆蓋的，就在公園下面那邊。就是壓不住嘛！三、四十年前亂啊！就是不順啦！打架、自殺什麼都發生，還發生包水果的包商跑路的，老人家說這不安定，所以請人家來看，有人指點說這裡太陰了，我們原先那三尊神壓不住，所以請了城隍爺當主神嘛，加上大家都想發財嘛，所以就再多了財神爺。

在地理師的解讀下，村中不平靜是因為所處之地太陰了，不是勢力單薄的山神所能解決的。在安奉神像不能雙數，只能單數的情形下，陸續增加了神像，且以城隍爺為村廟之主神。不過，村人不管於神明生日祭或是神明換新裝時，皆稟持對眾神公平處理的態度，現任慶安宮的主委阿義解釋道：

後來有請教平地人，後來開始有山神、龍王（指的是南鯤身王爺），因為人家說神明不能是雙數要單數嘛，就再多安了土地公。等到後來在安奉城隍時，也是這樣不能雙嘛，所以有個財神爺嘛，就有五尊神明。那既然做神明生日，就要公平，不能說這一尊神明做，那一尊神明不做，就像我們前兩、三年神明都換全新的，也是一樣要公平，要換新的就五尊全換，不然的話神明也是會抗議呢！

過往，廟房事務都是由歷任的村長或是村長指派負責，近幾年來，廟房事務已由第二代接手，並仿效埔里地方上村廟的作法，組成慶安宮管理委員會專門運作廟務，甚至與埔里鎮寺廟互有交流（孟智慧 2004: 63）。我發現關於祭拜儀式的過程或內容方面，村民抱著積極學習的彈性態度，讓祭拜儀式有越來越豐富的趨勢，例如二〇一一年初二頭牙祭時，主委阿義突然敲鐘擊鼓引發在場村民笑聲與不解：「阿義在幹嘛？」、「怎會有這個？」經瞭解才知道這「敲鐘擊鼓」是新的儀式。除此之外，主委阿義表示，在得知二〇一一年的母親節並無三個新村集體一起過時，他即決定由慶安宮出面主辦，但因財力關係，僅限於博望新村第

一代女性有一紅包。由此可見，慶安宮除了廟務或祭祀的運作之外，也會關注村中事務如慶祝母親節之類的安排。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日，霧社水龍宮媽祖繞境活動來到博望新村，當媽祖快到村落時，會有村人通報各家戶於門口擺上祭品準備迎接媽祖。媽祖到村落廣場後，有事先安排好的村民負責迎接儀式，接著繞經村落每一家戶最後到慶安宮祭拜。慶安宮裡另有人負責擺上茶水與餅乾讓參與繞境的信徒享用。過程中，我發現媽祖繞境時雖也到壽亭宮，但僅於村中之廣場上，擺幾張桌子集中村人放祭品祭拜，並無人負責接待事宜。簡言之，兩村廟相形之下，慶安宮與外界寺廟交流的運作上顯得嫻熟與順暢。

相對於壽亭宮僅安有一土地公，一年僅一次土地公廟會，博望慶安宮一整年裡舉行七次之多的祭拜儀式¹⁸，並且會於每次祭祀結束後，仍保留上一代長輩的傳統進行雞骨卦來看看當年的運勢。從前，通常是由七位男性長輩輪流看卦，看完後再綜合看卦人的意見（孟智慧2004: 64）。由於前幾年老人家相繼過世，村中僅剩的三位第一代對看卦不再參與且無任何意見，目前看卦的責任全落在第二代身上。

幾次參加慶安宮相關祭祀活動時，發現有幾位第二代男性村民可以說上一點雞骨卦，其中主委阿義比其他村民可說出多一些卦的訊息，一般村民也以他的看法為主。阿義說，雞骨卦也可以問私人的事情，但來看或關心雞骨卦者並不多，在場村民也無一人問私事。二〇一年山神祭儀時，甚至發生將要留下來看卦用的雞骨頭被煮掉，使得無雞骨頭可看卦的情形。看卦習俗依然存在，但不如第一代長輩們專精，加上不少第二代村民從事觀光業，可投入村廟祭儀的時間與依賴看卦的行事者漸漸變少，使得看卦傳統逐漸流於形式。

每當慶安宮舉行祭儀時，除一般家戶會自行備妥三牲或水果去廟房祭拜外，通常一大早就會有村民負責殺雞與準備三牲等公家祭品，以便稍晚時由主委率村人們一同祭拜。在多次的祭儀中，以農曆七月的普渡最為盛大，如同壽亭宮的土地公生日一樣「比過年熱鬧」。

不同類型的村外人，包括生意人和過去的主管機關與部隊的老長官，都會來此參加普渡法會，成為村內與村外居民重要的社交活動機會之一（孟智慧 2004: 63）。也就是藉由一年一度的普渡法會，一方面可因宗教活動讓彼此有較友善的互動，舒緩長久以來村民與外來生意人之間的敵意；另一方面得以藉此與場部和安置其他地區的過去戰友敘舊，以保持與清境

之外的義民間的聯繫。

博望慶安宮不管祭儀儀式的規模大小，於祭拜儀式結束後，通常都會有「平安餐」¹⁹的活動。宴會的形式因規模的大小，分為請專人辦桌或村人自行下廚等不同形式。二〇一〇年，我參加普渡法會時，一位第二代村人提到請專人辦桌的原因：

以前我們村子不管是結婚的、喪事的、廟裡拜拜的，都是自己人做，自己人煮，現在老人家做不動了，年輕人又忙，像做民宿的、餐廳的，在暑假都很忙，像今天又是星期六，每一家都忙不過來，只好請人幫忙囉！

以往家戶清一色都是務農為主的年代，凡村子裡大小慶典一定是村民自行動手準備。但近年來，不少家戶年輕人投入觀光事業，已不似當年在人力與時間方面好掌握，要挪出大量時間投入慶典事宜確實有所困難。所以像較盛大之活動，如普渡的平安餐或尾牙宴，都改請專人辦桌；其他神明生日宴因規模較小，仍由村人自行下廚料理。

和前述壽亭宮的情形一樣，村人自行下廚的聚餐是做給「自己人」吃的，在料理菜色上都以自己人吃的口味為主。在做菜的過程中，「廚師」的角色是主動、自由與流動的，誰都可以過來拿上大鍋鏟往鍋裡的菜餚翻攪幾下，再交給下一個人，如此人來人往相互交談、嬉謔的輕鬆氛圍，使得廟房後方的廚房總比前庭熱鬧喧嘩。不少男性村民一臉得意與驕傲地告訴我：「我們松崗（指博望）可是男人下廚做飯給女生吃喔！」慶安宮廟會時大多為男性張羅準備與掌廚，此情況與交由專業外燴業者負責時，村人不需特別幫忙是完全不同的。

照村民的說法男性掌廚是博望新村的傳統與特色，在實際參與後，發現其實仍有少數熱心的女性協助清洗等工作，但大部分的料理準備如切菜或下鍋炒菜，確實以男性居多。在居民完成的《走過異域五十年——清境社區歷史照片專輯》（2007）中，紀錄有一九八五年之慶安宮廟會，由大多們掌廚留下的影像。

藉由一年裡，多次廟會聚餐自行下廚的機會，村人們在玩笑與嬉謔中一同洗菜、切菜與拿鏟子翻攪菜餚。雖然，男性村民常以「男人下廚，女人涼快」來自嘲，但更重要的是，整個準備料理與吃的過程，有助於淡化村民平日彼此緊張或尷尬的事情，而使得內部成員情感



1

1 博望尾牙時，村民會廣邀外地上山做生意或務農的朋友來吃尾牙

2

宴，一為慶祝，二為拓展人群網絡。2 博望村民習慣於廟會祭儀後，保留上一代留下來雞骨卦的傳統，從雞骨掛的型態來看當年的運勢。

更加凝聚與認同。總的來說，不管是壽亭宮或是博望慶安宮的慶典，不單是社區認同感的創造與再創造，還是村落與外界聯繫的途徑。表面看來，祭拜儀式是主要內容，但走出村廟，我們可以發現村神生日實在是個大宴賓客的日子（王銘銘 1997: 73）。村廟祭儀活動正如俗話說的「一請神，二請人」，一請神指的就是為了祈求和酬謝神明的庇佑，二請人即是請親朋好友來參加村廟宴會，聯繫彼此間的感情，也就是建立人際網絡的好時機。

¹ 當時洪富勝一面做生態導覽與跑車越野事業，並且任清境社區總幹事一職，對社區文化有很深的投入與關懷。

² 「趕擺」（或稱「作擺」）是雲南西雙版納、德宏地區傣族的一種宗教活動，凡過年過節、婚、喪、病等都要進行，尤其是每年傣曆年九月十五日（相當漢人農曆六月中旬）至十二月十五日（農曆九月中旬），為關門節至開門節期間，人們多以賤佛為要事，其中「趕擺」活動更是頻繁，人們在擺期內不會去田裡勞動，都到佛寺拜佛，直到開門節後才恢復平靜（王懿之 1990: 407-424；謝世忠 2001: 17）。

³ 孟智慧（2004: 46）表示，由於人群來源歧異與遷徙頻繁，其註定分類的局限性，就如她於清境訪談的五位傣黑自述生於緬甸，她們分別屬黃傣黑、小傣黑、大傣黑，以及真正的傣黑，而這當中可能有支系的區別；自述來自中國地的擺夷，在過去她的家鄉可能歸屬緬甸地所轄；自述為緬甸地的阿佤雖生於緬甸，但不意味世居於此之意；也有雖自述為擺夷者，但她家鄉的親人在中國的民族識別下已經被訂為布朗。

⁴ 除一般的蒜頭、薑與蔥外，八角、茴香、花椒、薄荷、辣椒、芹菜（韭菜的一種）、新鮮當歸等是他們日常飲食常用的香料。這首歌收錄在《我歌、我情、我鄉》清境社區口述歷史調查計畫紀錄影片中，此影片曾於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八日，在南投縣文化局審查該計劃之期中報告時，於博望新村之文康室放映。

6 這首是藍賀大媽用客家鄉語唱出這一首吃飯歌，我將它收錄在《我歌、我情、我鄉》之清境社區口述歷史紀錄影片中。

7 蘇先生現年近七十歲左右，也是雲南人。十來歲時被抓去當兵，來臺灣時還年輕，所以就繼續在桃園當兵，直到退休之後，才來壽亭熟識的黃姓友人家住，目前定居埔里。日前因壽亭有位大媽過世，他特地上山來探望喪家，順便在村子裡串門子看看老朋友。

8 這裡的「自己人」泛指不同時期由滇緬邊區撤退來台後，安置在臺灣北、中、南三個地方的人群。

9 紅袍子指的是野生草莓，因為紅紅的所以當地人稱之為紅袍子。

10 三位伊斯蘭教徒為雲南籍的第一代男性。基督徒則以第一代女性中的拉祜族人為多，她們在家鄉時就已於寨子裡的教堂受洗。

11 目前聚落裡仍有基督傳道人傳道，但整體上，除上述的拉祜族大媽們外，仍少有人轉宗。

12 國民賓館左前方斜坡上的茶園中，有一十分迷你的「見晴廟」，供奉觀世音菩薩。在我觀察之下，少有義民聚落的村人會前來拜拜，前來者大多為遊客，所以未將其列入討論範圍。

13 爐主通常在前一年土地公生日當天透過擲筊產生，任期一年。土地公生日前一天爐主會前去祭拜土地公，而暖壽時爐主會準備大部分的食物，邀請村中較會做菜的人負責處理，其他村人則一起幫忙。

14 城市來的資本家或有錢的民宿經營者等，皆被當地人稱為「體面的人」。

15 邀請卡發放的對象是以清境外來之民宿業者與生意人為主，壽亭與定遠之居民被視為壽亭宮的主人，所以不需發邀請卡。二〇一〇年負責送邀請卡的曼菊，十分在意送邀請卡時講話的內容跟態度，當我陪同前往時，要求我演練一次給她看看是否表現得當。

16 如身為漢人的管大媽在家鄉有難骨卦的經驗，她認為：「喔喔！卦不得，卦不得！這事非同小可嘎，這是關係到整個村子人的事，這麼重要的事萬一給看錯了，那很麻煩的，那誰擔得起嘎？在我們家鄉是有卦啦！都是個人做生意或和人打官司，看會贏不會贏，看會不會賺錢卦的嘛！跟我們這個情況是不一樣的嘎，我跟你說嘎，看卦可不是簡簡單單喔，那是有學問很複雜的喔，馬虎不得，不能隨便看看隨便說說就算的呀！所以我說不卦嘛！不卦的好呀！」

17 爐主與副爐主在土地公生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在籌備會議中掌有相當的指揮權，還得負責活動部分的相關費用，小到金紙、燈籠，大至豬公費用。部分村人擔心因花費太重，有些人當上了爐主或副爐主後，無法負擔而影響活動的進行。

18 慶安宮廟碑記載，當時正值政府推行復興中華文化之際，村民雖向場部申請建廟，但經費上是由村民自己籌措。孟智慧（2004：93）提到，放領期間土地經重新測量後，發現原本集資購得的廟房為國有財產局的土地，非私人土地，不得申請放領，所幸

沒有被清查佔用的風聲傳出，以致村民繼續將此廟地當成村民共有的財產。我發現這兩年發生村民佔用農場土地或國有財產局土地情事，都會被檢舉或面臨拆除的命運，以致村民談到這個問題時格外小心謹慎。

18 從農曆年初二的頭牙、農曆二月二日的土地公生日、農曆三月十六日中路財神和山神生日、農曆四月二十六日的南鯤鯓王爺生日、農曆五月城隍爺生日、農曆七月申元普渡和農曆十二月十六的尾牙等，共有七次大小規模不同的祭祀活動。

19 村人稱有關村宗教性質之聚餐活動為「平安餐」。



村民與遊客高舉火把時，讓「清境火把節」的現場達到最高潮的氣氛。